学校的理想装备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爱国英魂——革命先烈篇
BOOK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编 者 的 话

看到《爱国英魂》这个书名，少年朋友们就会想到了，这一定是讲英雄的书；再看看三本书的副题，又是一目了然：分别要讲各个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的著名爱国者的事迹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，每个人也都应该热爱自己的祖国。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，为捍卫祖国的尊严而献身，这历来是最光荣最崇高的精神。这样的人，也是最受人们尊敬和热爱的。

比如在“古代雄杰篇”里，那些在国家和民族危急时刻挺身而出、为国分忧、为国捐躯的人们，那些不畏强暴、为发展和壮大自己国家和民族而奋斗的人们，不也就是古代中国最令人难忘的杰出人物吗？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，尽管政治上有合有分，各民族之间有团结也有矛盾，但是从历史上看，各民族都为中国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，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也是杰出的爱国者，那崇高的气节是中国人共同的精神财富。

比如在“反侵略志士篇”里，那些在鸦片战争以来的 100 多年中，面对外国入侵奋起抗争、以身许国的人们，不就是在我国近现代史上辉耀史册的“民族魂”吗？其中有些人，在其他方面，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错处，但是他在爱国还是卖国这个问题上做对了，做出了贡献，人们就会记住他，肯定他。他就是当之无愧的爱国英雄。

比如在“革命先烈篇”里，那些为推翻反动统治、为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而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们，不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令万世敬仰的人之典范吗？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和推翻“三座大山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，尽管纲领、任务不同，但是这些先烈都有着炽热的爱国激情，都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。

爱国，包含着极为广泛的内容。爱国者，遍及社会各个角落，绝不只是书中介绍的这几十位，他们只是一小部分有代表性的。既然热爱祖国是中国人最宝贵的品质，既然为国献身是大家引以自豪的品质，那就让我们以书中的这些代表们为楷模，接受祖国的考验吧！

我们相信，当你读完这几本书的时候，心中定会升起一股热情，一股使你激动、催你奋进的热情。那么，你将如何认识这股热情、如何引导这股热情呢？

爱国英魂——革命先烈篇

为共和牺牲的第一人——陆皓东

陆皓（hào）东和孙中山是志同道合的亲密朋友和战友。早在学生时代，陆皓东就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肆无忌惮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。他在悲愤之余，萌发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强烈愿望。

最初，陆皓东想通过改良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。1894 年，他陪同孙中山，带着一封写给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信，长途跋涉到天津，想恳求李鸿章接受他们富国强兵的主张。不料，李鸿章根本不理睬他们。

通过这件事，陆皓东彻底放弃了改良主义的幻想。他认识到：救中国必须反清，解救中国危机的惟一出路就是革命！

回到广州后，陆皓东立即把父亲留下的遗产变卖了，当作活动经费，在广州和香港之间进行革命联络。这时候，孙中山已经到了美国檀香山，在那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兴中会。

1895 年 1 月，孙中山返回香港，在陆皓东的协助下，筹备建立兴中会总部。总部成立这天，陆皓东和孙中山并肩宣誓：“ 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合众政府…… ”

不久，传来了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消息。接着，清政府又在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上签字，顿时举国震惊，群情激愤。兴中会决定于同年 10 月 26 日（农历九九重阳节）发动反清武装起义，夺占广州。陆皓东兴奋极了，他亲手设计绘制了一面青天白日旗，作为起义的旗帜。这就是后来的国民党党旗。总部交给陆皓东的任务是：在广州建立起义的领导机关。

起义的计划确定以后，陆皓东迅即从香港回到广州，租下双门底的王家祠，建立了起义的总机关，还特意挂上一块“ 农学会 ”的牌子作掩护。

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，陆皓东配合孙中山，联络了广东各地的会党和各路好汉，购买了 6 千支新式手枪，还预定从香港调入 3 千名勇士，准备工作大体就绪。

随着起义日期一天天临近，陆皓东也一天天消瘦下来，可他的精力却丝毫不减，浑身就像有使不完的劲儿。

起义的那天清晨，发生了叛徒告密的不幸事件。敌人在广州的防卫加强了，还四处搜捕革命党人，形势急剧恶化。

陆皓东听到风声以后，果断发出通知，疏散起义人员。为了战友们的安全，他直到大家走尽才离开指挥部。行进中，他突然想起兴中会会员的名册还留在指挥机关，立即返身回去取。身旁的一位战友劝他：“ 现在回去已经来不及了，是要冒生命危险的…… ”陆皓东打断了他的话，神色严肃地说：“ 会员的名册太重要了，一旦落入敌人手中，按名册捉拿我们的同志，后果将不堪设想，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全多数的同志，这是我的责任！ ”

就这样，陆皓东毅然返回了机关，刚关上大门，就被军警团团围住。他毫不慌张，迅速地取出名册，引火点燃。当敌人冲进来的时候，名册已经化为灰烬。他怒视着敌人，嘴角露出一丝胜利的微笑。

陆皓东被捕以后，敌人对他严加审讯，喝令他跪下。他昂首挺胸，拒不下跪，表现出一个革命党人的浩然正气。

敌人让他交代“ 罪行 ”，他大笔一挥，当场写下一篇慷慨激昂的“ 供词 ”：“ ……当今的政府是腐败专制的政府，当今的官吏是贪污无能的官吏，洋人正阴谋吃掉我们，国家已到了遍地哀鸿的地步，谁见了能不伤心落泪……起

义的事虽然没有成功，但我并不遗憾。你们只能杀我一人，却不能杀尽我的后来人……”

敌人喝令陆皓东交代他的“同党”遭到严词拒绝后，竟对他施行了惨无人道的酷刑，用铁钉钉他的手脚，用凿子凿他的牙齿……

陆皓东几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，但他一苏醒过来，就大骂敌人不止：“你们可以严刑拷打我，但我肉痛心不痛，你们休想让我屈服！”

1895 年 11 月 7 日，年仅 28 岁的陆皓东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。

在反对腐败的清朝政府的革命浪潮中，陆皓东最先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挥洒在祖国的土地上。孙中山称赞他是：“为共和国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。”

革命军马前卒——邹容

20 世纪初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潮汹涌澎湃，席卷中国大地，冲击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，使他们的统治摇摇欲坠。在众多的革命宣传品中，有一脍炙人口的名篇《革命军》，它的作者就是自称“革命军中马前卒”的邹容。

邹容在国内读书时就树立了反清救国的志向。1902 年春天，他自费留学日本。一踏上日本国土，邹容就深受留日学生中浓烈的革命气氛的感染。不久，他就成为最受大家欢迎的爱国演说家、革命的吹鼓手。

有一次，东京的留学生举行聚会。一个保皇分子散布的反对革命的言论，让邹容怒不可遏。他当即大喝一声：“够了，快滚下去！”随后，他登上讲台，以“掷笔而起”为题，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观点：“如今洋人欺负我们，国家不得安宁，我们还能安下心来读书吗？所以我主张大家丢掉手中的笔，起来做拚死的斗争！”

“好个‘掷笔而起’，说下去！”人们纷纷喝彩。邹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又说：“俄国人侵占我国的东北，我们当然要跟俄国人斗，但还要跟清政府斗。你们不信，请看朝廷近来做的每一件事，哪一桩不是奉洋人的命令……所以我说，俄国人坏，躲在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更坏。今天不起来造反，更待何时！”“哗！”会场上掌声四起，倾向革命的学生顿时占了上风。

沸腾的战斗生活，使邹容的民主革命思想日渐成熟了。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同情革命、理解革命、投身革命，邹容写成了一部约两万字的书稿。这就是不朽的名篇《革命军》。他在绪论中向国民大声疾呼：

“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强国，地球上之主人翁，不可不革命。革命哉！革命哉！我同胞中，老年、中年、壮年、少年、幼年，无量男女，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？”

在《革命军》中，邹容向世人痛诉：中华民族已到了“十年灭国，百年灭种”的险恶境地，必须与清政府“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”，扫荡帝国主义这个“外来之恶魔”，才能洗净“历史之污点”，使“祖国之名誉飞扬”。

为了宣传反清革命的神圣意义，邹容不遗余力，对革命作了刻骨铭心的赞美：

“革命者，天演之公例也；革命者，世界之公理也；革命者，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；革命者，顺乎天，而应乎人者也；革命者，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；革命者，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；革命者，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。”

章太炎读过《革命军》的书稿以后，称赞他是“义师先声”，是震动世人的“雷霆之声”。他亲自为《革命军》作序，并在上海的《苏报》上为这本书作了大量的宣传。

1903 年 5 月，《革命军》问世了。它很快风靡全国，短短几年间就重印了 20 多次，销售了 100 多万册，居当时革命书刊销售量的第一位。

孙中山见到《革命军》以后，要求“从速印之，分派各处，必能大动人心，他日必收好果。”鲁迅回忆当年读这本书的感受时说：“倘说影响，则别的千言万语，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《革命军》。”可见，《革命军》不仅是同敌人斗争的武器、冲锋的号角，它还教育和引导了整整一代人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，不愧是辛亥革命前夕最有影响力的文章。

正因为《革命军》的作用超过了千军万马的力量，所以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，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，特意追赠已经去世的邹容为“大将军”。

1905 年 4 月 3 日，一个凄风苦雨的早晨，关押在敌人监狱里的邹容在经受了百般折磨之后，口吐鲜血，离开了人世。

邹容只活了 20 岁。他的一生虽然短促，但他却在更短的瞬间里，以自己生命的全部心血和热能，迸射出夺目的光芒，辉映后世。邹容和他的《革命军》将世代受到人们的景仰和传诵，将永载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斗争的史册。

唤醒睡狮的宣传家——陈天华

“大江歌罢掉头东，
邃密群科济世穷。
面壁十年图破壁，
难酬蹈海亦英雄。”

这是青年周恩来在赴日本留学前写下的一首诗篇，表达了他对蹈海英雄陈天华的崇敬和怀念。陈天华是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，他写的《猛回头》、《警世钟》两本小册子，是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有影响力的宣传品之一，可以看作是邹容《革命军》的姐妹篇。 1905 年 12 月 8 日，年仅 30 岁的陈天华为了唤醒被称作“东方睡狮”的祖国和亿万苦难同胞，在日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，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奏出了悲壮激昂的爱国绝唱。

1903 年春，正是日本和俄国争夺中国东北领土的时候，在日本留学的陈天华积极参加了拒俄反清组织。一天晚上，陈天华在寓所里回想起连日来的斗争场面，对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切齿之恨使他无法平静下来，他不由得思念起湖南的父老乡亲，“我要让国人都了解国家面临的空前惨剧，从沉睡中醒来，共赴国难，决不能让可爱的祖国任人宰割！”这个念头一起，他猛地咬破手指，写下了“敬告湖南人”5 个殷红的血字。一连几个夜晚，陈天华蘸着自己的鲜血和热泪，写了几十封血书，分别寄给湖南的各个学校。所有收到血书的人，都被陈天华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了，有的人流下了眼泪。

但几十封血书的影响力毕竟太微弱了，陈天华于是决定写书，用老百姓都能接受的大众化语言，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弹唱形式，讲出深刻的革命道理，使大家既容易懂，又容易记住。陈天华只用了很短的时间，就写成了《猛回头》和《警世钟》。他在《猛回头》中首先讴歌了伟大的祖国：

“我中华，原是个，有名大国，
不比那，弹丸地，僻处偏方。
论方里，四千万，五洲无比，
论人口，四万万，世界谁当。
论物产，真是个，取之不尽，
论才智，也不让，东西两洋。”

然而，这样一个富饶美丽的祖国，如今又是怎样一副惨景呢……

“痛只痛，甲午年，打下败阵；
痛只痛，庚子岁，惨遭杀伤；
痛只痛，割去地，万古不返；
痛只痛，所赔款，永世难偿；
痛只痛，东三省，又将割献；
痛只痛，法国兵，又到南方；
痛只痛，因通商，民穷财尽；
痛只痛，失矿权，莫保糟糠；
痛只痛，办教案，人命如草；
痛只痛，修铁路，人扼我吭；
痛只痛，在租界，时遭凌践；
痛只痛，出外洋，日苦深汤。”

在如此深重的困难面前，清政府又“名存实亡，替洋人，做一个，守土

官长。”事已至此，惟一的出路就是反帝、反清，争取中华民族的自强，请看《猛回头》结尾的壮烈誓言：

“哪怕他，枪如林，炮如雨下；
哪怕他，将又广，兵又精强；
哪怕他，专制政，层层束缚；
哪怕他，天罗网，处处高张。
猛睡狮，梦中醒，向天一吼；
百兽惊，龙蛇走，魑魅（chī mèi）逃藏。
改条约，复政权，完全独立；
雪仇耻，驱外族，复我冠裳。
到那时，齐叫道，中华万岁！
才是我，大国民，气吐眉扬。”

《猛回头》和《警世钟》问世后，很快传到国内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《警世钟》一连被翻印了十几次，少年毛泽东正是在读了《警世钟》以后，才“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。湖南一些进步学校还把《猛回头》当作学生课本，有人甚至把它排成节目，谱上曲子，到处演唱。

清政府非常恐惧，下令严禁，结果却适得其反，越禁越多，越传越广。《猛回头》、《警世钟》和《革命军》一道，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。

1905 年 11 月，日本政府颁布了一项严禁中国留学生参加爱国活动的‘取缔规则”，激起了 8000 多名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，他们举行罢课等各种抗议活动。但在日本政府的强大压力下，有些人屈服了，忍气吞声地回到书房。日本报纸趁机大作文章，对中国留学生讽刺挖苦。陈天华怒火中烧，多年郁积的忧国忧民意识猛烈迸发，他决心一死，来表示对敌人的抗议，唤起依然沉睡不醒的同胞。

陈天华投海以前，留下了一封绝命书，希望用自己的牺牲使同胞团结一致，“共讲爱国”。陈天华逝世后，人们在《民报》上看见他的遗像，读到他的《绝命辞》，无不悲恸欲绝。当他的灵柩运回湖南，送岳麓山安葬时，一支自发组织起来的绵延数里的群众队伍，不顾清朝当局的阻挠，手举白旗，高唱挽歌，为以身殉国的烈士送葬……

如今，被陈天华的警钟唤醒的中华儿女，早已使伟大的祖国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。但英魂永驻，警钟长鸣，告诫我们的子孙后代，千万不要忘记中国近代史上受尽屈辱的年代，要加倍珍惜今天的美好时光，争取更加美好的未来！

甘洒热血的反清志士——徐锡麟

辛亥革命前的十几年间，革命党人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风起云涌，此伏彼兴，仅在安徽安庆就爆发过两次起义，其中第一次起义的领导者是徐锡麟。

徐锡麟是浙江绍兴人，和鉴湖女侠秋瑾既是同乡，又是志同道合的战友，他们都极力主张用武力反抗清王朝的黑暗统治。徐锡麟为了打入敌人内部，掌握军权，花钱捐了一个道员的官职。

临上任前，徐锡麟深知此行凶多吉少，语重心长地对朋友说：“法国革命 80 年才成功，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。我这次到安徽去，就是预备流血的，诸君切不可引以为惨，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。”这种准备为革命献身的决心使大家十分感动和敬佩。

到任以后，办事干练、足智多谋的徐锡麟很快就得到安徽巡抚恩铭的信任和重用，他从武备学校副办，一直升到巡警学堂堂长。在学堂里，徐锡麟白天督练操课，晚上宴饮将士，师生关系非常融洽。他还派挚友陈伯平、马宗汉往来浙江、安徽两地，互相联络。两省出现了喜人的革命形势。

1907 年 6 月，由于浙江会党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警觉，秋瑾通知徐锡麟，要求尽快采取行动，定于 7 月 19 日两省同时起事。不料 7 月 1 日这天，一个光复会会员在上海被捕叛变，供出了他所知道的革命党人名单。两江总督端方立即电告安徽巡抚恩铭，严令搜捕。由于名单上所列的名字很多都是革命党人的别名、假名，恩铭不知道名单上的第一个就是徐锡麟的化名，还找徐锡麟商议缉拿革命党人的事。

徐锡麟巧妙地瞒过恩铭，决定把起义日期提前到 7 月 8 日。这是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，他想趁安徽的清朝大吏出席典礼的机会，将他们一网打尽，然后高举义旗，夺占安庆，直捣南京……徐锡麟还派人通知秋瑾，让她在浙江同时起事，和安徽呼应。谁知，一切刚刚布置就绪，又发生了意外情况，恩铭因为有事，要求毕业典礼提前两天举行，这样一来，不仅起义要再提前举行，而且来不及通知秋瑾了。

7 月 6 日清晨，徐锡麟把学生们召集起来，鼓动大家说：“我此次来安庆，专为救国，并非为功名富贵到此，诸位也总要不忘救国二字，行止坐卧都不可忘，如忘救国二字，便不成人格。”他反反复复，大讲救国道理，打动了在场学生的心，但他们并不了解徐锡麟讲这番话的真正用意。

上午 9 点，当恩铭带着一班高级官吏来到巡警学堂以后，徐锡麟从筒靴里拔出两只手枪，把恩铭打倒在地。随后，他又抽出快刀，拍案高呼：“抚台已被刺，快跟我革命！”可惜，由于寡不敌众，这次起义失败了。

敌人当天就对徐锡麟进行审讯。有一位官吏问徐锡麟：“恩大人平时对你不错，你为什么要杀他？”徐锡麟回答：“恩铭待我是私情，我杀他是公义，私情怎么能战胜公义呢？又有一位官吏问：“还有哪些人是革命党？”徐锡麟答：“凡是想救国而不愿给外人当奴隶的，都是我的同党，但在安庆的只有我一个。”敌人威胁要剖出徐锡麟的心肝，祭奠恩铭。他仰天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，即使你们把我的身体碎成千万片，我也在所不惜，区区心肝就更不在话下了。”他最后又补充说：“你们只管杀我好了，但不要冤杀别人。”

晚上，敌人在安庆抚署东门前，凶残地杀害了徐锡麟，烈士的一腔热血喷洒在祖国的大地上。安庆起义虽然失败了，但徐锡麟刺杀恩铭那壮烈的一

幕，却激励起更多的后来者，掀起更大的革命风暴，直至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。

鉴湖女侠——秋瑾

在清朝末年出现的革命志士中间，有一位是自称“鉴湖女侠”的秋瑾。

秋瑾从小就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，骑马击剑，能诗善文，养成一副比男子毫不逊色的刚烈性格。

秋瑾走上反清的革命道路，是从“家庭革命”开始的。她 21 岁那年，由父亲作主，嫁给一位姓王的公子哥儿，两人志趣不同，性情也合不来，这使她感到十分苦恼。秋瑾不甘心被禁锢在家庭的小圈子里，决定走出家门，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。

惟一使秋瑾牵挂和难以割舍的是她的两个孩子。为了重整破碎的河山，使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妇女、儿童不受煎熬，秋瑾牙一咬，毅然把两个孩子寄养到绍兴娘家，变卖掉自己的首饰当路费，于 1904 年夏天，踏上了东渡日本的征途。

秋瑾写过这样一首诗：

“万里乘风去复来，只身东海挟春雷。

忍看图画移颜色，肯使江山付劫灰！

浊洒不消忧国泪，救时应仗出群才。

拚将十万头颅血，须把乾坤力挽回。”

在后来的反清斗争中，她完全实现了自己在诗文中发出的誓言。

1905 年冬，清政府串通日本当局，禁止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开展革命活动。为此，学生们中产生了分歧。有人主张立即回国参加革命，有人主张念完书再回国。

有一次，正当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，秋瑾一个箭步跨上讲台，“唰”地从筒靴里抽出一把刀，往讲台上一插，厉声说道：“我想代表回国的同学说句话，如果有人回到祖国，投降清朝，卖友求荣，欺压汉人，就让他吃我一刀！刚才还是一片嘈杂声的会场，顿时鸦雀无声了，留学生们都向秋瑾投去敬佩的目光。

回国后，秋瑾立即奔走于浙江、上海之间，联络会党，创办《中国女报》，研制炸药，准备发动反清起义。秋瑾认为起义的条件成熟了，就和徐锡麟商定，于 1907 年 7 月初，分别在浙江、安徽等地同时起义。

但是，意外的情况发生了，徐锡麟在安庆不幸遇难，绍兴的革命党人也暴露了目标，遭到清政府的搜捕。

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秋瑾丝毫没有退缩，她决意要和敌人一拚到底！

秋瑾昂起头，对好心劝她的朋友说：“自从锡麟遇难以后，我就决心一死了。革命必须流血才能成功。这些年来，不少男同志抛头颅，洒热血，但还没有听说有妇女死于革命的。为了唤起民众，就让我做中国女界为革命死难的第一个人吧！”

秋瑾被清军逮捕了。敌人要她供出同党，遭到秋瑾严辞拒绝。

敌人用死来威胁她，她凛然答道：“革命党人不怕死，要杀便杀！”

敌人又把纸笔放到秋瑾面前，叫她写供词。秋瑾望着外面飘飘扬扬的秋雨，一阵秋风拂面而过。她奋笔写下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7 个大字，表达了她对祖国的眷恋、对民族前途的担忧和对革命遭受挫折的悲愤。

敌人下达了处决秋瑾的命令。1907 年 7 月 15 日，32 岁的秋瑾身穿白布

衫、黑纱裤，从容镇定地走向绍兴轩口亭，英勇就义。行刑前，她无限深情地举目四望，向苦难深重的家乡父老作最后的告别。

秋瑾烈士倒下了，但若干年后，在绍兴轩口亭却竖起了一座纪念碑。这位巾帼英雄的光辉形象将永远矗立在人民的心中。

浩气长存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

1911 年 4 月 27 日，广州爆发了威震清政府、轰动全世界的黄花岗起义，这是武昌起义之前，革命党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、影响最深、战斗最激烈的反清武装起义。孙中山先生对黄花岗起义作了高度评价。

起义是在 4 月 27 日下午 5 点 30 分开始的。随着一声号令，以黄兴为首的 100 多位勇士，左臂缠着白毛巾，手握武器，如同猛虎下山一般，直扑督署，两广总督张鸣岐仓皇逃走。革命党人放火焚烧了督署后，又冲杀出来，和清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，经过彻夜战斗，革命党人虽然异常英勇，无奈人单势孤，无法战胜从四面八方冲来的清军，终于败散。

在起义队伍中，有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，他就是生前被誉为“ 炸弹大王 ”、死后被追封为“ 大将军 ” 的喻培伦。他用心钻研化学，为革命党人制作炸弹。在一次试验中，他被炸坏了一只手，但仍继续试验，终于研制出威力强大的炸药炸弹。起义前，有人劝他：“ 你有技术专长，不应当这样去死，你将来能为革命做很大的贡献呀！ ” 喻培伦说：“ 革命是需要技术，但技术是不会磨灭的，我死了还会有其他人来干。 ” 起义时，他胸前挂着满满的一筐炸弹，边冲边向敌人投掷，直到弹尽被俘。临刑前，喻培伦怒斥敌人，英勇就义。

方声洞在战斗中孤身被围，毫无惧色，挥弹击杀清兵 20 余人。最后，他遍体鳞伤而死，实现了他在《绝命书》中的誓言：“ ……以强祖国，使同胞享受幸福，虽奋斗而死，亦大乐也！ ”

英俊潇洒的林觉民在起义前三天，用一块白手帕写了一封信，托人带给自己的爱妻陈意映，和她诀别。起义失败后，林觉民被俘。他面对两广总督张鸣岐，痛斥清廷的暴政，最后，他怀着“ 为天下人谋永福 ” 的理想，含笑就义。

林觉民的同胞兄弟林尹民也是在这次起义中牺牲的。林尹民的同窗好友林文是最先冲进督署的勇士之一。火烧督署以后，林文和一股清军遭遇，被一颗流弹击中头部，不幸牺牲。

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中有不少是华侨，新加坡印刷工人李文楷、南洋机器工人黄鹤鸣、马来亚华侨李炳辉等都在激战中英勇献身。越南华侨罗连就义前高呼：“ 中国非革命无以救亡，请后人前进！ ” 华侨李雁南就义前对警兵说：“ 请用枪从口击下！ ” 说完，张口饮弹而死。烈士中年龄最轻的是华侨余东雄和游寿，他们牺牲时才 18 岁。这次起义，共有 100 多位革命党人牺牲。

起义失败以后，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着杀头的危险，组织群众收殓了 72 具烈士的遗体，把他们埋葬在广州城外的黄花岗。从此，人们把他们叫作“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”，把这次起义叫做“ 黄花岗起义 ”。

后来，人们修建了庄严肃穆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。孙中山亲笔为陵园题了四个遒劲的大字：“ 浩气长存！ ”

武昌首义三烈士

武昌首义三烈士指的是彭楚藩、刘复基和杨宏胜三位革命党人。他们在武昌起义的前一天不幸被捕，1911 年 10 月 10 日凌晨，相继被清政府的刽子手杀害。因为他们牺牲在武昌起义前十几个小时，所以被人们称为武昌首义三烈士。

1911 年 10 月，武昌地区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起来，组成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，准备发动武装起义。10 月 9 日上午，正当起义领导人孙武试制炸弹的时候，不慎发生了火药爆炸。清朝湖广总督瑞澂（chéng）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立即下令全城戒严，搜捕革命党人。

刘复基、彭楚藩、杨宏胜三人不幸被捕。瑞澂听说抓住了革命党人，立即召来督练公所总办铁忠等人，连夜会审。第一个被提审的是彭楚藩。铁忠见他身穿宪兵制服，而管宪兵的人又正是自己的亲戚，怕受牵连，就暗示彭楚藩说：“ 你不是去抓革命党人的宪兵吗？怎么把你也错抓来了？ ”没想到彭楚藩根本不买铁忠的帐，他正色地答道：“ 没有抓错，我正是革命党！ ”

接着，彭楚藩又用手指着铁忠说：“ 我们一定要推翻清朝，建立民国，你们的死期马上就到了。 ”铁忠大怒，要彭楚藩交代他的“ 同党 ”，彭楚藩冷笑一声，说：“ 我的同党有四万万同胞，分布在中国的每一块土地上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！ ”铁忠气得脸色发白，喝令将彭楚藩推出斩首。彭楚藩一边走，一边高呼：“ 可惜今晚的大炮没有打响，不然，你们早就完蛋了…… ”烈士就义的时候，年仅 27 岁。

刘复基第二个被押上公堂，铁忠一见就知道他是条硬汉子，心里很怵（chù）。不出他所料，刘复基不等他多说，就开口道：“你们少罗嗦，快杀了我，倒也爽快，我再不会受你们的压制了！”临刑前，年仅 26 岁的刘复基用尽全身气力，向越聚越多的人群高呼：“ 同胞呀，大家快起来革命！ ”

28 岁的杨宏胜第三个被押上公堂。他虽已身负重伤，仍傲然挺立着，一上来就举起受伤的手臂，指着铁忠破口大骂：你们这群狗奴才，只管杀我好了，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！ ”说完，杨宏胜就被推出东辕门，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。这时候，乌云密布的武昌城哭泣了，天上下起了濛濛细雨，为三烈士送行。

如今，在三烈士牺牲之处，竖起了烈士纪念碑。镌刻在烈士纪念碑身背面的《三烈士赞》，永远记下了他们贡献于祖国的高风亮节。

二七大罢工的工人领袖——林祥谦

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，为了推动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，在全国各地接二连三地掀起罢工浪潮。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懂得：只有组织起来，才能战胜自己的敌人。在斗争中，京汉铁路工人中涌现出一个突出的代表，他就是工人领袖林祥谦。

林祥谦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，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好习惯。他性格倔强，是个爱憎分明、见义勇为的少年。父亲进一家造船厂当工人以后，林祥谦也进厂当了一名童工，和自己的父兄一道，吃尽了监工的苦头。他恨透了那些对洋人屈膝弯腰，对工人凶神恶煞的监工。

后来，林祥谦离开了福建老家，带着一手钳工的绝活，到汉口谋生。不久，他就被江岸铁路工厂录用，成为铁路工人中的一员。

当时，铁路工人的工资很低，林祥谦把父亲、妻子和二弟从老家接来后，挣的钱只够四口人勉强餬口，可他还是经常拿出自己的工钱，去帮助更穷困的工人。哪怕家里用瓜菜当饭，一天两餐，他也不在乎。他总盼着有一天，普天下的穷哥们都能过上好日子。

1922 年的一天，武汉地区党组织的负责人陈潭秋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项英都来到江岸，帮助组织工人俱乐部。

林祥谦受到“ 天下工人是一家 ”的革命启蒙，心胸豁然开朗。他兴冲冲地把刚刚学到的革命道理讲给父亲、妻子、左邻右舍和工友们听。他对工人们说“ 资本家不劳动，反倒赚钱多，住高楼洋房，还整天欺侮我们 ”时，工友们都点头赞成。他又给工人出点子，说：“ 工人没有结成团体就要受压迫，我们要先成立工人俱乐部，团结起来和他们斗争！ ”工友们都热烈响应。

1922 年 1 月，江岸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了。林祥谦和近千名工人参加了隆重的成立大会，他被工友们一致推选为俱乐部干事。

俱乐部成立以后，工友们再也不怕那些监工了。一天早上，江岸的交通车上发生了一起铁路稽查殴打工人的事件。林祥谦了解了事实真相以后，决定要发挥俱乐部的力量，打击敌人的气焰。他亲自到路局交涉，提出要路局头子到俱乐部赔礼道歉、赔偿工人损失、严惩打人凶手等 7 项条件，并警告当局，如果不在 4 小时内答复 7 项条件，工人将全体罢工。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，工人们对林祥谦佩服极了，都把俱乐部当成自己的命根子。

这年秋天，江岸工人俱乐部改为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，深受工人信赖的林祥谦被选为工会委员长。不久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。

1923 年 2 月 3 日，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开始了。林祥谦被指定为江岸地区的罢工总负责人。当天晚上，林祥谦向会员们报告了军阀吴佩孚派军警破坏总工会成立的经过，点燃了工友们胸中的斗争烈火。

第二天上午，林祥谦一声令下：“ 拉响汽笛，罢工！ ”顿时，汽笛怒吼，声震长空，世代当牛作马的江岸铁路工人高擎铁棒、木棍，涌出了厂房、车站，京汉铁路全线瘫痪了。

惊慌失措的吴佩孚立即调兵遣将，妄图破坏大罢工。敌人几次试图诱骗工人复工，都没有得逞。吴佩孚气急败坏，撕下“ 保护劳工 ”的伪装，下令荷枪实弹的军警，向罢工工人猛扑过来。林祥谦眼看情况紧急，指示工人纠察队，作好战斗准备。

7 日下午，反动军警包围了江岸工会，经过一场激战，有 37 名工人壮烈牺牲，60 多名工人被捕。林祥谦在被捕前，镇定地销毁了工会会员名单和机密文件。

晚上，北风呼啸，雪花纷飞，江岸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。敌人把林祥谦捆绑在站台的灯柱上，威逼他下令复工，林祥谦双目圆睁，怒斥敌人。刽子手挥起马刀，先向林祥谦的左臂猛砍一刀，恶狠狠地问：“上不上工？”

“不上！”林祥谦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刽子手又向林祥谦的右臂猛砍一刀，疯狗般地嚎叫：“你到底下不下复工命令？”

浑身是血的林祥谦忍住剧痛，坚定地回答：“上工要有总工会的命令，我的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没有总工会的命令，工是不上的！”

敌人露出了豺狼的本性，向林祥谦连砍数刀。一阵钻心的剧痛，林祥谦昏了过去……

当这个铁打的汉子苏醒过来的时候，他使尽最后的气力继续痛斥敌人：“一个好端端的中国，就断送在你们这群军阀走狗手里……”不等林祥谦把话说完，刽子手又向他连砍数刀。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子林祥谦就这样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。

林祥谦烈士倒下了，但他并没有死，他那无所畏惧、宁死不屈的光辉形象，已经永远载入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史册，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。

视死如归的民主革命家——廖仲恺

1903 年 9 月的一个晚上，廖仲恺和夫人何香凝在日本和孙中山相识了。廖仲恺对孙中山在会上宣传的革命道理非常信服，以后，他又几次登门拜访孙中山，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。在以后 20 多年的战斗生涯中，廖仲恺不仅是孙中山的坚定追随者，而且是这位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得力助手。

1905 年夏天，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建立了中国同盟会，廖仲恺成为最早的会员之一。夫人何香凝由孙中山介绍，成为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。

辛亥革命后不久，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。接着，革命党人发动讨伐袁世凯的“二次革命”也失败了。在那艰难的岁月里，廖仲恺竭尽全力，充分发挥自己的“理财”特长和组织才能，保证了革命党人的斗争能在逆境中坚持下来。

1922 年 6 月，孙中山一手扶植起来的广东省长陈炯明，勾结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，趁孙中山挥师北伐、后方空虚的机会，发动兵变，背叛了孙中山。在炮轰广州总统府的前两天，陈炯明为了断绝孙中山的“财源”，逮捕了廖仲恺，把他囚禁在广州西郊。事后，陈炯明得意洋洋地说：“这下，我算把孙大炮的荷包锁住了。”廖仲恺深知自己处境险恶，但他视死如归，做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。他在戒备森严的铁窗内，作诗和夫人何香凝诀别：

“后事凭君独任劳，莫教辜负女中豪；
我身虽去灵明在，胜似屠门握杀刀。”

他还写了一首给女儿梦醒、儿子承志的诗：

“女勿悲，儿勿啼，阿爹去矣不言归。
欲要阿爹喜，阿女阿儿惜身体。
欲要阿爹乐，阿女阿儿勤苦学。
阿爹苦乐与前同，只欠从前一躯壳。
躯壳本是臭皮囊，百岁会当委沟壑（hè）。
人生最重是精神，精神日新德日新。
尚有一言须记取：留汝哀思事母亲。”

这两首诗，表现了廖仲恺坚贞不屈的革命意志，显示了他以身殉国的大无畏英雄气概。

廖仲恺在被陈炯明囚禁了 60 天后，经多方营救，才逃离了虎口。他脱险后，立即赶到上海和孙中山会合，共商革命大计。

不久，廖仲恺带着一项秘密使命，奔赴日本。这一次，他是作为孙中山的代表，去和苏俄代表越飞商讨联俄、联共问题的。

为了遮人耳目，这次会谈借“养病”名义，在一家僻静的饭店里举行。廖仲恺和越飞天天接触，讨论得非常融洽。他还从越飞那里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后发生的重大变化，懂得了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。会谈后，他们发表了著名的《孙文越飞宣言》，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。

1924 年 1 月，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，经过廖仲恺的积极协助和策划，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会上，廖仲恺不顾国民党右派的压力，坚决拥护孙中山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。

国共合作实现以后，廖仲恺真诚地和共产党人合作，他和李大钊、周恩来、苏兆征、彭湃等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着亲密关系。他作为党代表主持黄埔

军校工作期间，坚决支持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。廖仲恺积极赞助和推动工农运动，维护工农利益。

廖仲恺的所作所为，引起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刻骨仇恨。 1925 年 3 月孙中山逝世以后，廖仲恺强忍住悲痛，身兼 13 项职务，挑起了实现孙中山未竟事业的重任。敌人把廖仲恺看成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他们经过秘密策划，决意要对廖仲恺下毒手。

一时间，广州城内谣言四起，有人甚至公开扬言要杀害廖仲恺。何香凝十分担心廖仲恺的安全。劝他多增加几个卫兵。可廖仲恺一笑置之，坦然地说：“ 增加卫兵，只好捉拿刺客，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。我是天天到工会、农会、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说，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，他们要想谋杀我，很可以假扮着工人、农民或学生模样，混入群众中间下手的。我平生为人作事凭良心，自问没有对不起党、对不起国家、对不起民众的地方。中国如果不联俄、联共，就没有出路。总之，生死由他去，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。 ”

遇害的前一天，有人把右派要杀害廖仲恺的确切消息告诉他，廖仲恺听后，只是感叹地说了一句：“ 现在正值国家多难之秋，我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！ ”他已经作好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。

1925 年 8 月 20 日上午 8 点，廖仲恺在何香凝陪伴下，乘车去中央党部开会。他刚下汽车，就遭到暴徒枪击，身中四弹，在送医院抢救途中死去，为民主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，终年 48 岁。

廖仲恺被暗杀的消息传来，广州沉浸在无限悲痛的气氛中。出殡那天，20 多万工人、农民、学生，以及黄埔军校的师生，向廖仲恺的英灵伫立默哀。省港大罢工委员会在《通告》中，赞誉廖仲恺先生是“ 无产阶级的好朋友 ”。

10 年以后，廖仲恺先生被迁葬到南京紫金山中山陵附近。廖仲恺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。

北伐英雄——曹渊

提起北伐战争中的叶挺独立团，大家都会异口同声地说，这是一支为北伐的胜利立下了不朽战功的“铁军”。团长叶挺的名字就更为大家所熟知了。曹渊是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，中国共产党党员，他指挥的第一营是“铁军”中的“铁军”。

曹渊队少年时起就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军队，为讨袁军传送信件和消息。讨袁战争失败以后，他的哥哥被通缉，家中房屋被烧，牲畜被抢光，一家人流离失所。家庭的灾难和敌人的凶残，点燃了曹渊心中反抗的火种。

不久，曹渊考入了黄埔军校，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当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，参加了曹渊入党时的小组会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现在入党了，今后更要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政策，做党的忠诚战士，做革命军队的优秀指挥员！”这番话被曹渊牢牢地记在心里，他当场表示：“我一定在党的领导下，起先锋模范作用，决不辜负党的培养和关怀。”从此，他走上了自己人生道路的新起点。

曹渊以优异的成绩，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，立即被党派往黄埔军校教导团学兵连任党代表。在广东革命政府对地方军阀的两次“东征”中，曹渊都表现出一个优秀指挥员的牺牲精神和军事才能。

当曹渊调任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后，独立团就作为北伐军的先遣队，挥师北上。一路上，独立团夺关隘（ài），克名城，长驱千余里，又在汀泗桥、贺胜桥接连击败吴佩孚的“奋勇队”，直逼武昌城下。在历时 4 个月的胜利进军中，哪项任务最艰巨，就由一营来承担；哪里的战况最激烈，也由一营来冲击，曹渊和他的部下总是在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出现，奋勇拼杀。

9 月初，对武昌城的攻击就要开始了。第一营被挑选作攻城奋勇队。接受任务后，曹渊召开党小组会，号召党团员在战斗中起模范作用。

会后，一位当班长的共产党员来找曹渊，说：“我一定冲锋在前。如果我死了，请把这封信、这包衣服和这几块钱寄给我母亲。”这位班长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：

“……为着打倒帝国主义、打倒军阀而战死，虽死犹生。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为着人类社会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战死，是光荣的。儿的躯体虽死了，但精神是不死的。儿是永生在母亲面前的……”

一营像这样写家书的人，还有很多。这种留下家书，誓死攻城的动人事迹，很快就在独立团、北代军和武汉人民中传开了。人们感慨地说：“真是古代有抬棺出阵的故事，今天有留书攻城的壮举啊！”

这天凌晨，攻城的战斗打响了。曹渊指挥的奋勇队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在城边竖起云梯，登城和敌人肉搏。但由于友军的登城部队没有跟上，一营的登城官兵成了“孤军”，但他们仍然以顽强的斗志，和几倍、十几倍、几十倍的敌人奋力拼杀，直到登城官兵全部壮烈牺牲。这时候，天已经亮了，曹渊只得等候增援部队到来，再作打算。他站在一个小土包后面写报告给叶挺：

“团长：天已拂晓，进城无望，职营伤亡将尽，现存十余人，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，如何处理，请指示。曹渊”

刚写到最后一个“渊”字，一颗流弹飞来，击中了他的头部。“渊”字的最后一笔失去了控制，拖了三四寸长。

曹渊倒下后，部下上来抢救，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喃喃地说：“我已

无救了，你们不要管我，为了革命，同志们冲啊！”战士们刚要把曹渊背下火线，他已牺牲了。

曹渊牺牲的消息传来，全军上下都感到万分悲痛。曹渊烈士捐躯疆场的事迹，激励着独立团广大指战员奋勇攻城。北伐军终于攻占了武昌，实现了烈士生前的遗愿。

后来，在一营战斗过的地方，人们为曹渊等在攻城中牺牲的官兵，竖起了一座墓碑，碑身上镌刻着曹渊等 191 位烈士的英名。解放后，为了永远缅怀先烈，当年的墓地被修葺一新，每年都要迎来一批又一批祭扫和瞻仰的人群。

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——李大钊

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，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。

在李大钊之前，许多志士仁人在黑暗中摸索，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，都没有成功。李大钊从少年时代就树立起“挽救民族”的志向。像前人一样，他孜孜不倦地寻求使中国走向光明的道路。

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，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。李大钊成为中国接受马列主义的第一人。

1918 年 1 月，李大钊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，并且参加《新青年》的编辑工作，积极地投入新文化运动。他还把很多的精力用来研究俄国革命问题。

不久，李大钊发表了关于十月革命的第一篇论文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》。这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传播。后来，他又连续发表了《庶（shù）民的胜利》、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等文章，颂扬十月革命，主张“以俄为师”。

1919 年爆发了“五四”爱国运动，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，以李大钊、陈独秀为首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，开始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。陈独秀在上海筹备建党的时候，对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拿不定主意，就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。李大钊非常明确地答复说：叫共产党！党的名称就这样确定下来了。1921 年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。

党成立后，李大钊为了促进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，亲自领导了北方的工人运动，并和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携手，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。

1926 年 3 月 18 日，北京十多万各界群众在天安门集会，强烈抗议日、英、美、法、德等 8 个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，李大钊是大会的主席之一。在会后组织的 2000 多人的请愿活动中，李大钊走在群众队伍的最前面。军阀段祺瑞下令军警用排枪、刺刀和大刀，向群众疯狂砍杀、射击，造成 40 多人死亡，200 多人受伤的空前惨剧。李大钊的头部和双手都负了伤，但他不顾个人安危，仍镇定地指挥群众撤退，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。

“三一八”惨案的第二天，段祺瑞就下达了捉拿李大钊的命令。只是由于冯玉祥的国民军开进北京，赶走了段祺瑞，李大钊才暂时脱险。他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，继续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坚持斗争。

第二年 4 月，一向反共的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，经过周密策划，调集了 300 多名军警、特务，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，悍然袭击了苏联大使馆，逮捕了李大钊。

在狱中，敌人用种种酷刑拷打他，折磨他，用竹签钉进他的指甲缝里，甚至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。但是，他始终坚贞不屈。在法庭上，任凭法官和狗腿子们怎样吼叫、威吓，他都态度“极从容，毫不惊慌”，他“身着灰布棉袍，青布马褂，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”。

敌人又想用高官厚禄来收买他。李大钊当即回答：“大丈夫生于世间，宁可粗布以御寒，‘晚食以当肉，安步以当车’，就是断头流血，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，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，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，做无耻的

帮凶和奴才！”

在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李大钊还不忘解救和他一起被捕的青年，把一切可能被敌人治罪的事，全揽到自己身上，为青年们极力开脱。但在 20 多天的监狱生活中，他却一次也没有提到自己的“家事”。有一次在法庭上见到了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时，他只是瞅了瞅她们，没有说一句话，脸上的表情非常平静。他惟一念念不忘的，是亲爱的党，是他鞠躬尽瘁的共产主义事业！

4 月 28 日，敌人的特别法庭不顾舆论的强烈谴责，判决对李大钊等 20 名革命者处以绞刑，随即秘密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执行。面对敌人的绞刑架，他泰然自若，带着不可侵犯的威严目光，含着让人永远难忘的坚定笑容，第一个走到绞刑架下。

李大钊壮烈地牺牲了，他以自己不到 39 岁的生命，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、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不愧是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伟大人物。同时，他又是一个道德高尚、品性纯洁、作风质朴、平易近人的普通人。就连他的敌人也只能夺去他的生命，攻击他的信仰和言论，却丝毫不能攻击他的人格。李大钊为中华民族留下的丰厚精神遗产，将与山河同在，与日月齐辉！

广州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人——张太雷

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政治活动家，广州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人。

张太雷少年时代最敬佩的人是孙中山。他上中学那年，辛亥革命爆发了，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，乘火车去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。经过常州的时候，张太雷挤在欢迎的人群中，望着从车窗里微笑着向人们招手的孙中山，心情非常激动。他立志要以孙中山为榜样，长大后投身救国救民的事业。

后来，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，还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，签订了灭亡中国的“二十一条”。张太雷气愤地对同学们说：“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，是要独占中国，灭亡中国，而袁世凯为了要当皇帝，不惜出卖国家主权。”从此，他开始走出书斋，投身爱国运动。

1915 年秋，张太雷考入了北京大学法科预科，但由于经济条件差，不得不转到天津北洋大学法政科学习。他一边工作，一边读书，在艰难的条件下仍取得优异的成绩。他酷爱英文，由于他的勤奋和天赋，很快就能从事翻译工作了。当时，他靠给一家报纸当翻译挣的钱，供自己读书。后来，当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家，活跃在国际国内的政治舞台上时，他的翻译技能也为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

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，震撼了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张太雷的心。他坚定地表示：“我以后不当律师了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，才能救中国！”

在“五四”运动中，张太雷和景仰已久的李大钊建立了联系，还和周恩来等天津爱国运动的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他很快就从一个向往革命的青年，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。

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，面对敌人到处举起的残杀共产党人的屠刀，一些胆小的人退缩了，甚至有些共产党人也脱了党，一般同志难免对革命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，张太雷鼓励周围的同志们说：“无论怎样，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。我们的失败只是暂时的。”

不久，中国共产党发动了“八一”南昌起义，打响了向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第一枪，但没坚持多久就失败了。根据党中央的部署，张太雷毅然挑起了领导广州起义的重担。

当时，白色恐怖正笼罩着整个广州城。身为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太雷冒着生命危险，来到停泊在珠江边的一艘邮政船上，主持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负责人会议，传达了起义的决定。他兴奋地说：“同志们，报告大家一个重要消息，党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暴动！”大家听了十分兴奋，恨不得马上就动手。张太雷又告诉大家：“暴动是个大事情，一点也急不得，省委决定从现在起，积极进行准备。”接着，他对各项准备工作做了具体布置。

按照党中央的指示，这次起义的目的是要在广州建立党领导的红色政权——广州苏维埃政府。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充分准备，张太雷又秘密召开了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。他在详细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分布情况后说：“现在，正是我们举行暴动，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！”接着，他宣读了起义的口号和政治纲领，一条一条地解释，一条一条地通过。会上还选举产生了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执行委员名单。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了。

1927 年 12 月 11 日凌晨两点，起义的时间到了。张太雷来到誓师会场宣布：“现在，我们要在广州举行暴动，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，完全解除敌人

在广州的武装，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。教导团是暴动的主力，你们要勇敢战斗，完成党交给的任务！”最后，他慷慨激昂地说：“革命士兵兄弟们！在国民党反动派残暴统治下，你们除了和工人、农民一道，高举革命红旗，拿起武器，和反动派拚个死活外，第二条出路是没有的。起来吧，广州苏维埃万岁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万岁！”张太雷话音刚落，大家就高呼起革命口号，声震夜空。

教导团官兵在工人赤卫队、农民武装的配合下，只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的战斗，就占领了大半个广州。11 日黎明，身穿灰色军装的张太雷，容光焕发地来到广州苏维埃政府临时所在地，庄严宣告：“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！”

第二天，张太雷亲自主持了广东工农兵热烈庆祝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。会后，张太雷刚刚返回起义总指挥部，就听到敌军反扑的消息，他赶紧乘车去战事最激烈的地方指挥战斗，途中遭到敌人伏击，不幸壮烈牺牲，年仅 29 岁。

广州起义失去了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后不久，就在敌人绝对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失败了。

然而，张太雷和广州起义死难烈士的战斗决心和必胜信念，却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烈士们的血没有白流，它将奔涌在一代又一代革命青年的心中。

气壮山河的就义诗作者——夏明翰

1928 年 3 月 20 日，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夏明翰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写下了一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：

“砍头不要紧，
只要主义真。
杀了夏明翰，
还有后来人。”

夏明翰烈士牺牲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从一个落后挨打的旧中国，发展到一个独立自强的新中国，如今又跨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。然而，夏明翰烈士“砍头不要紧，只要主义真”这音韵铿锵（kēng qiāng）的诗句，仍然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。

夏明翰是怎样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，又是怎样用诗歌为武器，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呢？这得从他小时候说起。

夏明翰刚刚记事，知书达理的母亲就常给他讲中国历史上爱国人物的故事。孩子长大了，投身爱国运动，受到思想守旧的祖父的阻挠。当祖父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时，母亲就卖首饰，当家产，支持他走上革命的道路。

读书刻苦，善于独立思考，是少年夏明翰的一个突出特点。他从不以“夏府少爷”自居。有一次，他因为主动帮助女佣人挑水，遭到祖父的训斥，心里很不服气。后来，他对人说：“祖父要我背唐诗，我看他就没有读懂。唐诗中有两句：‘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’。他天天只知道喝茶、用水，哪知道挑水也不容易呢！”

从这件事可以看出，夏明翰不仅书读得深，读得透，而且能够结合实际来读。后来，当他愤感“人世不平”的时候，就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，树立起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。

夏明翰不论是从学生时代参加爱国学生运动，还是在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投身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，诗歌始终是他向敌人进攻的锐利武器。

有一次，他看见一幅揭露北洋军阀卖国嘴脸的讽刺画，觉得画得非常好，就为这幅画配了一首诗：“眼大善观风察色，嘴阔会拍马吹牛。手长能多捞名利，身矮好屈膝磕头。”把一副军阀政客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。

1922 年初，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和庞人铨被反动军阀杀害，夏明翰怀着极为悲愤的心情，挥泪写成一首长诗《江上的白云》，其中一段写道：

“听！那湘江的声音：
前头的去了，后面不断的逐着奔放。
看！那天上的白云：
上面的散了，底下不尽的浮着堆上。
前面的呐喊快止了，
后面又继起了摇天动地的哭声。
前面的血光快暗了，
后面的热泪，又海放江奔。
一点一滴，一寸一尺；
一分一秒，一时一日——前进不已！
到将来，自然有那光明灿烂的世界，
做我们的坟墓……”

这首诗在上海《劳工周刊》发表后，立即在广大工人中引起共鸣，人们把这首诗印成传单到处传播，成为当时鼓舞中国工人阶级斗志的一曲战歌。

1927 年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发生，夏明翰从《国民日报》上看到蒋介石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消息，悲愤地写下“越杀胆越大，杀绝也不怕。不斩蒋贼头，何以谢天下”的诗句。为了坚定妻子对革命的信心，夏明翰买了一颗小红珠，送给妻子，并用诗一般的语言对她说：“我赠红珠如赠心，希望君心似我心。”夏明翰还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“赤云”，表示深信革命红旗终将插遍全世界。

夏明翰被捕后，敌人对他施用了种种酷刑，都不能使他屈服、行刑这天清晨，遍体麟伤的夏明翰被押到汉口余记里刑场。当执刑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讲时，夏明翰厉声喝道：“有，给我拿纸笔来！”说罢，他昂首片刻，挥笔写下了开头那首“砍头不要紧”的气贯长虹的就义诗。

夏明翰用这首鲜血谱写的无产阶级战歌，为我们留下了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遗产。它属于整个中华民族，属于我们的子孙后代！

杰出的中国妇女运动领袖——向警予

1928 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，一位年仅 33 岁的女共产党员，高呼着“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”、“ 中国共产党万岁 ” 的口号，在汉口余记里刑场英勇地牺牲了。她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、党中央妇女部的第一任女部长、被誉为“ 中国妇女运动先驱 ” 的向警予。

向警予的家乡湖南省溆（xù）浦县，是个封建礼教影响很深的小山城，女孩子都要裹小脚、穿耳朵眼。向警予偏偏不听这一套，硬是不裹小脚。她还总爱和男孩子比高低，幼小的心灵中只佩服一个女英雄，就是中国古代女扮男装，替父从军的花木兰。向警予 8 岁就跟男孩子一起进小学读书，成为全县第一个进学校读书的女孩子。不仅如此，她的学习成绩也总是最好的。

向警予从长沙周南女校毕业回到家乡以后，为了实现“ 教育救国 ” 和妇女解放的理想，克服了重重困难，办起了全县第一所男女合校的小学堂。开学典礼上，她高声向女学生宣布：“ 为读书而读书，为嫁一个如意的丈夫而读书，不是我们读书的目的，我们读书的目的是要做个新国民。 ” 她发现，有不少女学生仍在受封建礼教毒害，裹着小脚，非常气愤，就鼓励她们放脚，还亲自给她们解裹脚布。有的女学生怕放脚后挨父母打骂，不敢回家，她又和老师们一个一个地把学生送回家去，直到说服了她们的父母为止。

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，身为党中央妇女部长的向警予深深地懂得：“ 只有彻底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，只有彻底打倒帝国主义，只有整个民族、整个劳苦大众都获得了解放，中国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！ ” 这样，她就从理论上为中国妇女运动找到了正确的方向。同时，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妇女运动的实践当中。仅在上海闸北区，向警予就办了 30 多所女工夜校，为推动上海的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。她还长期深入到女工当中，做她们的知心朋友，帮助她们解决生活困难，女工们都亲切地称她“ 向大姐 ”，只要是向大姐说的，女工们没有不跟着干的。

1924 年夏天，上海 14 家丝纱厂的 1 万 5 千多名女工，掀起了汹涌澎湃的罢工浪潮。在向警予的直接领导下，罢工从减少工时、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，发展成中国女工向资产阶级勇猛示威的政治斗争。经过 20 多天的同心奋斗，罢工终于胜利了。资本家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，广大丝纱女工经受了斗争的考验和锻炼，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。向警予从此成为深受女工爱戴的妇女领袖。

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，向警予不顾生命危险，继续留在笼罩着白色恐怖气氛的汉口坚持斗争。有一次，党中央派人来，通知她赶快转移。她不同意，说：“ 我知道反动派对我很注意，可是武汉的工人需要我，多留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。我请求党中央，让我留下来！ ” 党中央经过反复考虑，同意了向警予的请求，让她担任了党的地下刊物《长江》的主编。

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，同志们再次劝向警予离开武汉，还是被她谢绝了，她说：“ 形势越恶劣，我就越不能离开。《长江》一停刊，就等于宣布我们党在武汉失败了，这是对敌人示弱，我决不能离开！ ”

由于叛徒出卖，向警予不幸被捕了。她在牢房中仍不忘自己谋求妇女解放的责任。平时，她总要向难友们作革命宣传，介绍列宁，讲农村暴动，唱革命歌曲，提高大家的觉悟。每次受刑回来，难友们看到她血肉模糊的身体，

都难过得哭了，可她仍然打起精神，鼓励大家斗争到底。

最后一次审讯时，敌人恶狠狠地对向警予说：“ 我们已经查清，你就是向警予，是共产党的重要领袖，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死路，一条是生路，由你选择。 ”

向警予毫无惧色地回答：“ 不要多讲废话，要杀就杀！至于我是不是向警予，没有多大关系，横竖你们都是刽子手！革命者不会在你们的屠刀下求生。等着吧，你们的末日就在明天！ ”

恼羞成怒、无计可施的敌人决定对向警予下毒手了。

1928 年 5 月 1 日清晨，向警予穿好衣服，轻声地提醒难友们：“ 记得吗，今天是五一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示威的日子！ ”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她还在宣传革命，推进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。

在押赴刑场的路上，向警予高唱《国际歌》，高呼革命口号，向沿途的劳苦大众告别。

向警予牺牲 11 年后，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，高度评价了向警予革命的一生，他说：“ 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、女共产党员向警予。她为妇女解放、为劳动大众解放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。 ”

“农民大王”——彭湃

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，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农民运动领袖，他就是广东海丰农民运动和苏维埃的创始人彭湃。

1919 年伟大的“五四”运动爆发时，正在日本留学的彭湃就开始投身爱国运动。他曾经咬破手指，在白布上写下“毋忘国耻”四个大字的血书，寄回家乡海丰学生联合会。这条血书在海丰中学张挂起来后，大大激发了海丰青年的爱国热情。

两年后，彭湃从日本回到海丰，立即在这片生养他的土地上掀起了革命风暴。他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，对中国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和比较深刻的了解，他认识到要在中国进行革命，非把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不可！于是，他走到了农民中间。

最初，农民并不愿意接近彭湃。这是因为他的穿戴像官人，说话又像文人，农民当然有戒心啦。于是，他戴上尖顶竹笠，光着脚板，带着旱烟筒，用通俗的语言和农民交谈。这样他才真正和农民交上了朋友。

为了让农民了解他们痛苦的根源，彭湃常向他们讲“耕田亏本”的道理。他对农民说：“你们总说是欠地主的账，我说是地主欠你们的账。你们耕田耕到死，地主一点不劳动，结果谷子倒给地主收去了。这实在太不公平！这不是地主欠你们的账吗？我来就是想和你们商量，怎样去找地主讨还这笔账。”大伙儿听得睁大了眼睛，不住地点头。农民觉悟提高了，就向彭湃讨教和地主算账的办法。彭湃说：“办法就在我们自己，农民如果有了团体，把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，就可以迫使地主实行减租！”大伙都说这是个好主意，就按彭湃的办法，建起了农会。

一听说搞农会，首先出来反对的就是彭湃的家庭。他家是当地的大地主，有几百个农户租种他家的土地，每年要收入两千多担租谷。彭湃知道，要革命，就必须和自己的家庭彻底决裂。他和妻子一起毅然搬出了地主家的老宅。分家后，他把自己分到的那部分“田契”，亲自送给佃户，佃户们不敢要。彭湃就把他们召集到自家门前，手举着“田契”亲切地对大家说：“地主和官府勾结，抢夺了你们开垦的田地，强迫你们缴租，还立下‘田契’作为凭据，对你们进行残酷剥削。这是极大的犯罪！现在，我当着大家的面，把所有的‘田契’都烧掉，往后，你们就可以自耕自食，不用缴租啦！”说完，点起一把火，把“田契”全部烧光了。

这样一来，贫苦农民都跟彭湃一条心，海丰的农民运动很快就发展起来。彭湃担任了海陆丰总农会的会长。地主豪绅吓得心惊胆战，和官府勾结，拚命反扑，迫使海陆丰农民运动转入地下。通过搞农会的实践，彭湃积累了丰富的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。

1924 年春天，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彭湃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，担任了第一届中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任，培养出一批出色的农民干部。后来，毛泽东在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，彭湃又被聘为教员。他写出了《海丰农民运动报告》，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部农民运动的专著。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，彭湃为中国的农民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，彭湃来到江西南昌。这时候，他不仅是党中央委员，还是周恩来为首的“前敌委员会”委员。他协助周恩来发动了“八一”南昌起义。

不久，彭湃带着筹建工农兵苏维埃的重任，回到了海陆丰。这里的农民运动基础雄厚，在彭湃到来之前，刚刚发动了武装起义，赶跑了国民党反动派。彭湃一到海丰，整个县城都沸腾了。深受农民爱戴的彭湃立即投入筹建苏维埃的工作。

1927 年 11 月 18 日是中国农民运动史上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，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在海丰县红宫建立了。千百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奴隶，第一次成了主人。

1928 年初冬，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严密控制的中心城市上海，彭湃被叛徒出卖，不幸被捕。他把敌人的法庭当作痛斥反动派的讲坛，把牢房当成宣传工农革命的阵地，连押送他的士兵和看守他的狱卒都被他感动了。有一个狱卒还被他争取过来，帮助他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。

彭湃得知蒋介石下达了杀害他的命令后，无畏地对难友们说：“ 这是意料中的事，你们要坚持斗争到底，让共产主义在中国开花结果！ ”他在狱中给党中央、周恩来同志写了最后一份秘密报告，向自己最信任的战友表达自己的决心：“ 我在此精神很好 ”，“ 兄弟们不要因弟等牺牲而伤心 ”。平直朴素的语言中凝聚着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浩然正气。

彭湃被敌人秘密处决了，年仅 33 岁。党中央在彭湃牺牲后的《告人民书》中说：“ 谁不知广东有彭湃，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，土地革命的忠实领导者。 ”广大的中国人民尤其是几万万农民群众，将永远记住彭湃这个响亮的名字。

革命青年的楷模——恽代英

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，有一个深受广大青年热爱和尊敬的名字——恽代英（恽 yùn）。

恽代英上小学时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华，有“奇男儿”的美誉。他博览群书，又掌握了英文，视野迅速地从小世界扩展到大世界。

上大学时，恽代英为了实现献身社会的理想，在武昌发起成立了互助社，确定了“群策群力，自助助人”的宗旨。互助社不仅是武汉地区成立最早、影响最大的进步团体，也是全国最早的进步团体之一。它一成立，就受到青年们的欢迎和仿效，一批青年社团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武昌城。

“五四”运动爆发时，恽代英挺身而出，以互助社为核心，和林育南、施洋、陈潭秋等先进青年一起，领导了武汉地区各阶层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。

在斗争中，他先后结识了毛泽东、李大钊等革命者，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。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，他就申请加入党的组织，成为我国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。从此，恽代英以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姿态，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英勇战斗。

1923 年夏天，恽代英带着他在四川开展学生运动的丰富经验，应邓中夏邀请，到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任教。不久，他当选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，负责团的宣传工作，并担任团中央机关刊物《中国青年》的主编。利用《中国青年》这块阵地，他向全国青年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，宣传爱国思想，进行共产主义教育，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。

不论是亲身听过恽代英教诲的青年学生，还是深受《中国青年》影响的广大青年，都把恽代英当成自己的良师益友。在大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，更把恽代英当成自己的领袖和导师。

郭沫若回忆恽代英当年在四川工作的情景时，十分感慨地说：“……从四川那样的山坳里，远远跑到广东去投考黄埔军校的一些青年，恐怕十个有九个是受了代英的鼓舞的吧？”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期间，担任政治教官兼共产党党团书记，他不断地用革命思想武装青年军人，坚决抵制蒋介石企图把军校变成个人夺权工具的企图。

1927 年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在武昌主持军校工作的恽代英，立即带领军校师生和革命群众 30 万人，举行声势浩大的反蒋大会。大革命失败以后，恽代英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。尽管这两次起义都失败了，可恽代英仍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，他鼓励周围的同志们说：“挫折是不可避免的，要经得起挫折。”“我们干它 30 年，革命决不会一事无成！”

恽代英是蒋介石切齿痛恨的人，自然成为敌人重要的搜捕对象。多年来，他一直公开活动，很多人都认识他。到上海搞地下斗争以后，恽代英整天接触工人，难免抛头露面。但他不顾个人安危，毅然摘掉深度近视眼镜，装扮成工人，继续为党工作。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，他落入了敌人的虎口。最初，敌人没有弄清恽代英的身份，判了他五年有期徒刑，把他押送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。

在狱中，恽代英隐姓埋名，不理发，不刮胡子，使自己变成另外一副模样，坚持了一年多也没被敌人认出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，经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，鼓舞难友们的斗志，用通俗的语言，向难

友们讲解党的纲领，并写成了一本介绍党纲的工人读本。他还写下一首抒发自己革命情怀的《狱中诗》：

“浪迹江湖数旧游，
故人生死各千秋，
已拚忧患寻常事，
留得豪情作楚囚。”

这首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。

党为营救恽代英做了大量工作。正当他有可能被提前释放的时候，党内的大叛徒顾顺章出卖了恽代英。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以后，又惊又喜，立即派人到狱中查对。

敌人洋洋得意地拿出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时的照片，劝他投降。恽代英自豪地说：“我就是恽代英！”他还向敌人郑重宣告：“蒋介石叛变了，他反苏、反共、屠杀工农。我本人是共产党员，必须革国民党反动派的命，这也就是我现在的庄严任务！”

蒋介石见劝降不行，就亲自下达了处决恽代英的命令。

1931 年 4 月 29 日中午，恽代英拖着沉重的脚镣，迈着坚定的步伐，高唱着《国际歌》，走出了牢房。临刑前，他高呼：“打倒蒋介石！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他身中数弹，壮烈牺牲，年仅 36 岁。

恽代英的一生是光辉战斗的一生。周恩来在他牺牲 19 周年时题词赞扬说：“他的无产阶级意识，工作热情，坚强意志，朴素作风，牺牲精神，群众化的品质，感人的说服力，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。”

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——蔡和森

“五四”运动前后，一些立志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的中国青年，纷纷飘洋过海，赴法国勤工俭学，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，蔡和森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在勤工俭学期间，蔡和森接受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，和周恩来、赵世炎一起，筹建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，成为法国支部的创始人。他给国内的毛泽东写过两封长信，阐述自己的建党理论、路线、方针和指导原则，毛泽东非常赞同蔡和森的观点，他在复信中说：“你这封信见地极当，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。”

蔡和森和毛泽东是志同道合的挚友。他们都是杨昌济老师的得意门生，被杨先生称赞为“海内人才，前程远大”。

当时湖南的先进青年，都非常钦佩毛泽东和蔡和森的学识和名声，把他们当成自己的表率。

回国后，蔡和森立即担负起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任。他主编党中央的机关刊物《向导》，写了许多有分量的文章，宣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。《向导》一问世，就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，人们称颂它是黑暗中国社会的“一盏明灯”，四万万苦难同胞的“先锋队”、“救命符”，中华民族的“福音”。

蔡和森不仅是出色的宣传家，还具有杰出的组织才能。1925 年“五卅”惨案发生的当天深夜，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，蔡和森在会上提出了号召上海罢工、罢市、罢课，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屠杀的斗争策略，会议接受了蔡和森的正确建议。6 月 1 日，上海就出现了工人罢工、学生罢课、商人罢市的“三罢”高潮。蔡和森又进一步提出新的斗争策略：“在上海应当马上成立工商学联合会，成为这场反帝运动的总领导机构，以巩固和发展这一运动，成为长期的斗争；同时要马上把运动扩大到全国去……”果然，这个主张一实行，“五卅”的反帝风暴很快就席卷了全国。不久，又爆发了省港大罢工，使反帝爱国运动再起高潮，并且坚持了 16 个月之久，创造了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的奇迹。

蔡和森从小患有哮喘病，体质一直很弱。投身革命后，过度的劳累使他的病情加重了。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，蔡和森提出“以暴力对付暴力”的主张，制定了发展 5 万农民军的具体计划，要求地方党组织“找到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”。可惜，由于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占了上风，蔡和森挽救革命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。他住进医院后，不顾自己病情恶化，继续和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内的错误路线作斗争。

1927 年夏天，汪精卫在武汉屠杀共产党人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。蔡和森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，继续在反动派控制的中心城市坚持斗争。他还为恢复和发展北方党的基层组织、为党的理论宣传做了许多工作。

1931 年春，蔡和森去广东主持省委的工作，同时帮助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香港党组织。临行前，刚从香港回来的外甥女对他说：“那边的情况很糟，实在危险，还是暂时不要去吧。”蔡和森回答：“干革命，哪里需要就去哪里，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。”

蔡和森一到香港，就听说党内的大叛徒顾顺章，已经跟踪他到了香港。但他还是不顾危险，出席了 6 月 10 日在预定地点召开的一个群众集会，刚进会场，就被蹲在那里等他的便衣特务逮捕了。两天以后，香港英国当局把他

引渡给广东国民党特务机关。

在广州的监狱中，敌人对蔡和森施用了种种酷刑，把他折磨得血肉模糊，但却丝毫不能动摇他的坚强意志。最后，敌人灭绝人性地把蔡和森拉到监狱的墙边，用铁钉把他的四肢钉在墙壁上，然后用刺刀把他的胸脯戳得稀烂。年仅 36 岁的蔡和森就这样壮烈牺牲了。

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是一位胸怀博大的女子，她经常用秋瑾为革命献身的事迹，激励自己和教育儿女。除了培养出蔡和森外，她的另一个儿子蔡麓仙（蔡和森的哥哥）也是忠诚的共产党员，在省港大罢工中壮烈牺牲。她的小女儿咸熙（蔡畅）、女婿李富春、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，都是党的优秀儿女。然而，葛妈妈始终不知道蔡麓仙和蔡和森已经牺牲，直到去世前，她还托人写信告诉自己的儿子：“ 母亲已看不到你们事业的成功了。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。 ”“ 革命一定会胜利的。 ” 蔡和森面对敌人的铁钉和刺刀时，也是这样想的。他牺牲后，一直受到党和人民的深切怀念。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：“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。 ” 邓小平为蔡和森烈士题词：“ 蔡和森同志是我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，他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，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他。 ”

壮族人民的忠实儿子——韦拔群

在中国共产党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岁月里，在祖国南疆木棉花盛开的地方，出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，他就是壮族人民忠实的儿子、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、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韦拔群。

韦拔群自幼就是个出类“拔群”的孩子，常为受富家子弟欺负的穷孩子们打抱不平。长大后，他又成为一个憎恨反动统治阶级、同情劳动人民的热血青年。

1916 年，窃国大盗袁世凯称帝，云南护国将军蔡锷（è）起兵讨伐袁世凯。 青年韦拔群立即变卖了自己的部分田产，购买枪支，在家乡招募了 100 多名有志青年，投奔了反袁军。后来，由于他在军队中进行革命宣传，受到反动势力迫害，就脱离了旧军队，去上海、广州寻访他最仰慕的革命者孙中山。虽然他没有见到孙中山，但他并不灰心。

回到家乡东兰县武篆（zhuàn）区后，韦拔群立即扎到穷乡亲们中间，重新拉起一支农民武装，反抗地主的压迫。他率领农民自卫团三次攻打东兰县城，最后一次一度攻占了县城，赶跑了反动县长。不久，他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，参加了共产党人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，学习有关农民运动的理论。在那里，他还结识了彭湃等党的负责人，树立起了为穷苦人求解放的远大理想。当他再一次返回东兰县时，已经是一个有了明确斗争目标的成熟的农民运动领袖了。

韦拔群很快就建立起广西最早的县级农民协会——东兰县农民协会，还创办了广西最早的农民运动讲习所，先后培养了壮族、瑶族和汉族的农运骨干 600 多人，为开展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准备了条件。

敌人对农民运动恨得要死，怕得要命，迫不及待地派军队前来镇压，杀害乡民 700 多人。可是东兰等地的各族人民并没被敌人的凶残吓倒，他们宁死不屈，跟随他们最信赖的“拔哥”，和敌人展开游击战争，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。东兰农民揭开了广西农民运动的序幕，“拔哥”也成了广西远近闻名的人物。

自从韦拔群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广西农民协会的副主任后，他像上足了弦的发条，更加起劲地为革命工作。这时候，党中央派邓小平、张云逸来广西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。 1929 年 12 月 11 日，他们发动了“百色起义”，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，张云逸任军长，邓小平任政委，韦拔群任第三纵队司令。不久，右江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民主政权也建立起来了。

1930 年秋，红七军奉调北上，韦拔群被留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。为了加强北上红军的力量，韦拔群毅然把从东兰带来的 1000 多名精壮战士和好枪，全拨给了主力部队，自己只留下七八十个体弱有病的战士和 30 多支破枪。张云逸非常感动，分别前，他紧紧地握住韦拔群的手，说：“拔群同志，你留下，往后的工作会更加艰巨，斗争会更加残酷，要多依靠群众，依靠党！”韦拔群充满信心地回答：“不怕！这地方我熟，走了一千，还会有一万，有人就会有枪。我们一定坚持到红军主力打回来！”

红军主力一撤走，敌人立即反扑过来。韦拔群早有准备，他一面迅速地扩充自己的队伍，一面向山区转移。然后再利用山区的复杂地形，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，粉碎了敌人的多次“围剿”。为了鼓舞根据地群众的斗志，韦拔群编了一首《革命到底》的诗歌：

“穷人闹革命，众乡亲，
雄心要坚定。
那时灭土豪，吃穿好，
饭饱衣又新。
今日处恶境，但相信，
雾散天会晴。”

这首诗，充分表现了他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和乐观态度。

在斗争最艰苦的日子里，韦拔群始终和各族群众血肉相连，和他们睡山林，钻岩洞，吃野菜，嚼树皮。为革命，他一家 20 口人中有 10 多人被反动派杀害，其中包括他的弟弟和儿子。

敌人无法消灭韦拔群的队伍，就悬赏一万元捉拿韦拔群，但仍然达不到目的。可谁也想不到，敌人做不到的事却叫一个内奸做到了，这个内奸竟是韦拔群过去的警卫员。他被敌人收买后，于 1932 年 10 月 18 日夜，乘韦拔群发烧昏睡的机会，用驳壳枪朝他的头部连开了两枪。年仅 38 岁的韦拔群就这样不幸遇难。

“拔哥”离开了生养他的土地和各族人民，但他的战友和乡亲们并没有停止战斗，他们一直把斗争坚持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。直到今天，许许多多关于“拔哥”的故事，仍像发生在昨天一样，在右江各族人民中间传颂着。

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——邓中夏

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，邓中夏被誉为“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”。

“五四”运动中，邓中夏身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，是北京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和知名人物。后来，他在李大钊的影响下，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，开始从爱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者。

1920 年 2 月，邓中夏和一些青年学生，在天安门前召开人力车工人大会，宣传组织工会和车老板斗争，要求减少车租，改善生活。这次行动虽然没有达到组织工会的目的，却是邓中夏投身工人运动的开端。

邓中夏非常善于总结经验，他把在人力车工人中没有做成的事，拿到有 1000 多工人的京汉铁路机车车辆厂去做，终于获得了成功。邓中夏和几个大学生来到这个产业工人集中的大厂，和工人们同吃同住，缩小了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距离，取得了工人的信任，建立起长辛店工人俱乐部，把工人组织起来。 1922 年 8 月，邓中夏第一次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就取得了胜利。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，邓中夏已经担当起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重任。

1925 年，“五卅”反帝爱国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。正在广州的邓中夏立即同广东党的负责人陈延年、周恩来商议，决定组织香港、广州两地的工人，发动罢工，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。

邓中夏一到香港，就把中国共产党香港支部的成员召集到一起，研究如何发动罢工。有人对罢工信心不足，说：“上级的决定，我拥护。可是，就靠我们这一二十人，能把香港的几十万工人发动起来吗？”邓中夏说：“香港工人对英帝国主义是非常仇恨的。仇恨，这是埋在工人心中的炸药。一旦点燃，大家就会知道它的力量有多大了。”

又有人表示担心，说：“香港的工人组织都是旧式行会，这样的工会，能跟着我们走吗？”邓中夏解释说：“行会组织的头面人物都要名、要利。他们参加罢工，既可以得到爱国的名声，又可以得到罢工经费的实利。如果他们不参加罢工，一旦工人跟着我们走，他们的名、利也就完了。所以，争取这些人参加罢工，是完全可能的。”

这番话，说得大家不住地点头。认识统一后，邓中夏立即回到广州，设法解决罢工中最大的难题——食宿困难，因为香港的罢工一旦爆发，将有几十万罢工工人回到广州，如果食宿问题解决不好，罢工就没办法坚持下去。于是，邓中夏和陈延年一起去找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廖仲恺协商，得到了廖仲恺的支持。这样，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终于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。

罢工后，几十万香港工人陆续回到广州，和广州工人汇合，并按照预定计划，设立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和罢工委员会，负责领导罢工。邓中夏高兴地说：“这是一个小小的政府，是真正的工人政权。”他还亲自主编《工人之路》（特号），指挥罢工斗争。省港大罢工从 1925 年 6 月 19 日到 1926 年 10 月 10 日，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，成为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大罢工。邓中夏在这次罢工中显示出卓越的组织才能，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写下了灿烂的篇章。

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，邓中夏到国外积极从事国际工人运动。他在繁忙的工作中写出了《中国职工运动简史》，总结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宝贵经验。

1933 年 5 月，邓中夏在上海不幸被捕。他已经是第三次被捕了，前两次，

他都机警地脱了险，可这一次，尽管他化名“施义”，敌人还是从叛徒口中弄清了他的身份。邓中夏得知自己被叛徒出卖后，大义凛然地说：“我就是邓中夏，中共中央委员！”敌人想乘机追问，邓中夏一句话就把敌人堵了回去，他说：“这些已经够枪毙了，还有什么好问？”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战斗决心。

在一次审讯中，敌人问他：“难道你就不想出去，不想获得自由吗？”邓中夏用幽默的语调嘲弄敌人：“我没进来之前，就想到有一天会进来，现在进来了，倒从来没有想到出去。”敌人急了，拍着桌子吼道：“那好，我关你 10 年！”邓中夏放声大笑：“我看你们的政府在南京坐不了 10 年！”敌人把邓中夏押解到南京后不久，就决定杀害他。有一天黎明，牢门突然打开，邓中夏知道就义的时刻到了，他穿好衣服走出来，敌人问：“这是你最后悔过的机会了，还有话说吗？”邓中夏坚定地回答：“我一生没做过需要后悔的事！”他随即高呼：“打倒国民党！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一位难友怀着满腔悲愤，在牢房的墙壁上刻下了这一天的日期：“1933 年 9 月 21 日。”邓中夏牺牲在南京雨花台时，年仅 39 岁。这位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，用他不平凡的生活道路告诉了我们，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，共产党人的伟大革命精神究竟是什么。

强渡大渡河的红军十八勇士

1934 年 10 月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，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，开始了震惊世界的长征。

经过半年多的浴血奋战，由刘伯承司令员、聂荣臻政委率领的中央红军先遣队，胜利地通过了大凉山彝民区，来到四川省石棉县的安顺场一带。一条凶险湍急的河流挡住了红军的去路，这就是大渡河。当年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军的首领石达开，就是在这里陷入十几万清军的重围，五六万太平军全军覆没，石达开也惨遭杀害。

如今，红军的处境和当年石达开的处境一样危险。前面，大渡河对岸有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把守着，背后，国民党中央军和四川军阀的大部队正拚命追来。蒋介石以为这是歼灭中央红军的天赐良机，坐飞机赶到成都，亲自调兵遣将，扬言要让红军成为“第二个石达开”。

敌人的梦想不是没有根据的。大渡河沿岸都是高耸的绝壁，300 多米宽的河面中露出一块块大小不一的礁石，流速每秒钟 4 米的激流撞击着礁石，发出轰轰隆隆的咆哮声。对岸惟一能上岸的地方，是一条一丈多宽、401 级的石台阶，台阶顶上是敌人修筑的碉堡群，整整一个营的兵力驻扎在里面，严密封锁着渡口。

但是，红军有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，聂荣臻政委对先遣队的指战员们说：“我们不是石达开，也不可能成为石达开。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，这是石达开所没有的，我们一定要渡过河去，我们也一定能渡过河去！”

要渡河，就得有船。敌人早就把老乡们的船拖到对岸毁坏了，到哪里去找船呢？一营营长孙继先派人四处调查，连夜搜索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条敌人用来送信的小船。

强渡时间定在 1935 年 5 月 25 日上午，一营战士都争着要当突击队员。但船太小，容纳不了多少人，谁上谁不上，只能由孙营长来决定，他开始点名：

“熊尚林！”

“到！”二连连长熊尚林高兴地跨出队列，他被指定担任突击队队长。

“罗会明、刘长发、张表克……”

一个接一个勇士跨出了队列，共挑选了 16 人，后来又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通信员陈万清冲出队列，抹着眼泪要求参加突击队，总算被孙营长批准了。同时，还从老乡中找了一批最有经验的船工。这些突击队员，每人配备一把大刀、一支冲锋枪、一支短枪和五六颗手榴弹。

9 点钟，强渡开始。突击队员分两批出发，先上船的是以熊尚林为首的 9 名突击队员，小船离岸后，颠簸着朝对岸斜漂过去。为了掩护强渡的勇士，红军神炮手赵章成向敌人碉堡连连发射迫击炮，全部命中目标，3 名特等射手也用机关枪向敌军猛烈扫射。9 名勇士终于穿过惊涛骇浪和敌人的枪林弹雨，占领了滩头阵地。敌军见红军上岸了，惊恐万状，有 200 多人涌出碉堡，朝岸边反扑过来，9 名勇士殊死抵抗，决不后退半步。

这时候，营长孙继先已经带领第二批 8 名勇士，登上了返回的空船，向对岸驶去，不料江流太急，被冲到渡口下游 200 多米的地方。勇士们又跳入水中，逆水拖船，用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靠岸成功，和已经击退了敌军多次

反扑的第一批勇士会合。

敌人阻挡红军登岸的企图落空了，顿时军心动摇，开始退却。包括孙营长在内的 18 位勇士转守为攻，18 支冲锋枪吐着火舌，18 把大刀挥向敌群，直杀得敌人四散奔逃。渡口终于被勇士们占领了！

后来，红军又缴获了两条小船，加上原来的那条船，来回摆渡，红军先遣队三个团全部渡过了大渡河。

安顺场强渡的成功，为红军下一步飞夺庐定桥的战斗创造了有利条件。18 勇士以自己的壮烈之举，为中央红军杀出了一条通往胜利的路。中国革命的历史将永远记下这惊心动魄的一页。

飞夺泸定桥的红军二十二勇士

1935 年 5 月，红军先遣队虽然取得了强渡大渡河的胜利，但红军被敌人围歼的危险并没有解除。随着红军大部队的到来，几万人马要想靠三条船渡河，少说也得一个月，可用不了几天，国民党中央军就会赶到这里，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也在源源不断地向对岸集中。

毛泽东到达安顺场以后，立即向红军指挥员分析了面临的严峻形势，指出：红军必须尽快夺取位于安顺场上游的泸定桥，才能确保主力红军全部安全渡河。他当机立断，决定组成左右两路纵队，分别沿大渡河东西两岸向北进发。

刘伯承、聂荣臻率领已经渡河的部队沿东岸北进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率领未渡河的部队从西岸北进，直奔泸定桥。夺取泸定桥的主攻任务，交给了担任西路红军先头部队的一军团四团。这个团的团长是王开湘，政委是杨成武。

四团接受任务后，于 5 月 27 日清晨出发，飞速向北挺进。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有 320 里路，这是一条险峻曲折的羊肠小道，一侧是峭壁，另一侧是几丈深的激流。四团沿途消灭碰到的敌人，边打边走，第一天走了 80 里。但军委的命令是必须在 29 日夺下泸定桥，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了。要打仗、架桥，还要凭两条腿，走完 240 里山路，这可能吗？可这样的奇迹，硬是被红军创造出来了！　29 日早晨 6 点钟，四团按期到达了泸定桥。

泸定桥既不是木桥，也不是石桥，而是由 13 根 100 多米长的粗铁索组成的铁索桥。桥面 9 根铁索，两边各拉两根铁索，每根相距 30 厘米。敌人为了防止红军通过，把平时铺在铁索上的木板全部撤掉了，只剩下光溜溜的铁索链，悬跨东西两岸。桥身离汹涌的大渡河水有几十米高，不停地随风摇晃着，不要说走，就是往下瞧一眼，也会令人头晕目眩。

桥东岸就是泸定城，城墙有两丈多高，敌人还在东桥头修筑了防御工事，配备了机关枪、迫击炮等强大火力，真是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啊！

但红军的英雄好汉们没有退缩，他们抱定了一个信念：强行过桥！四团指挥员经过周密研究，制订了一个作战方案，决定把突击任务交给二连，由连长廖大珠和指导员王海云带队。三连担任第二梯队，紧跟在突击队后面，铺设木板，让后续部队迅速通过。突击队挑选了 20 位同志，加上廖大珠和王海云共 22 人，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。

下午 4 点钟，夺桥的战斗开始了。在战友们强大火力的掩护下，22 位勇士手持冲锋枪或短枪，背插马刀，腰缠 12 颗手榴弹，冲上了桥头。

敌人万万没有想到，红军竟然敢攀着铁索过桥，急忙集中火力，向 22 勇士射击，子弹从勇士们的头顶、耳边呼啸而过。突然，一个战士身体一歪，靠在铁索上，他受伤了，只要手一松，他就会掉进奔腾的激流，可他挺住了，咬紧牙关，继续攀着铁索，向前移动。

铁索通向西岸的距离在缩短，50 米，40 米，30 米，20 米，每缩短 1 米，勇士们都要靠超人的勇气和毅力，都要冒生命的危险，都要付出血的代价，可奇迹也正在这不断缩短的距离中产生，桥头——终于到了！勇士们大喊一声“冲啊！”一跃而起，直扑桥台。

敌人被 22 位勇士的壮举惊呆了，慌忙用煤油和稻草，点燃了台上的亭子，烈焰顺风卷来，把铁索烧得滚烫，一道道火墙挡住了勇士们的去路。这

时候，西岸的战友们吹起一阵雄壮的冲锋号，勇士们斗志倍增，一鼓作气，穿过了火海。廖大珠的帽子烧着了，他索性把帽子扔掉，带领其他勇士，旋风般地冲进了泸定城。

22 勇士在大街上和敌人巷战，子弹打光了，他们“ 唰 ”地一声把大刀抽出来，准备和敌人作最后的拚杀。在这万分危险的时刻，在后面铺木板的三连战士赶到了，早已魂飞胆裂的敌人开始狼狈逃窜。这时候，东路红军已在离泸定桥 60 里的地方击败了敌人的增援部队，保证了强夺泸定桥战斗的胜利。主力红军迅速通过了泸定桥，把追来的国民党中央军远远地甩在后面。

红军没有成为“ 第二个石达开 ”，蒋介石的梦想彻底破灭了。

为了永远记住红军十八勇士和二十二勇士的英雄业绩，在勇士们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修建了大渡河纪念馆。聂荣臻元帅为纪念馆题词，概括了红军强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的牺牲精神和战役过程，题词写道：

“ 安顺急抢渡，
大渡勇夺桥，
两军夹江上，
泸定决分晓。 ”

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——瞿秋白

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，有一个闪烁着特殊光彩的名字——瞿秋白。在他仅仅 36 年的曲折的人生旅途中，他既主持过党中央的领导工作，又遭受过“自己人”的“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”，但他仍任劳任怨，埋头苦干，为无产阶级的文化事业竖起了一座丰碑，直至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。

“五四”时期的瞿秋白是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，当时，他是北京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。他精通俄语、粗通英语和法语，还通过自学，获得了哲学、文学等方面的广博知识，这为他以后开拓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打下了基础。

1920 年秋天，充满革命激情的瞿秋白以记者身份，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——苏维埃俄罗斯，用了两年时间进行实地考察，写了《新俄国游记》和《赤都心史》两本文集，向中国人民宣告：伟大的十月革命是“20 世纪历史的事业之第一步”，莫斯科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“心海中的灯塔”，中国人民应当在这灯塔的照耀下“拨准船舵，前进！”

一年多以后，瞿秋白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回国后，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，先后发表了 100 多篇政治论文，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。每一个读过瞿秋白文章的人，都会称赞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，无产阶级的革命家、理论家和宣传家。

然而，瞿秋白更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！尤其是在党内王明的错误路线使他遭受极大冤屈、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职务之后，他仍遵守纪律，服从决定，不但丝毫没有挫伤为党、为人民工作的热忱和勇气，相反，他比以前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，在上海和鲁迅一道，肩负起领导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重任。

这样，在“五四”时期就投身新文化运动的瞿秋白，从 1931 年春到 1933 年秋的两年多时间里，不顾环境的险恶，不顾自己严重肺病的缠绕，凭借惊人的毅力，写下了 150 多万字的文学论著和翻译作品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！

为了粉碎反革命的文化“围剿”，瞿秋白和鲁迅、茅盾并肩战斗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鲁迅曾经送给瞿秋白一幅对联：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；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”表明鲁迅和瞿秋白的心是息息相通的。瞿秋白牺牲以后，鲁迅悲愤地说：“人给杀掉了，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，也是杀不掉的！”他抱病搜集了瞿秋白的一部分遗文，编成《海上述林》两卷，为亡友留下了永恒的纪念。

茅盾的著名长篇小说《子夜》刚刚写出四章，瞿秋白就向茅盾了解故事的情节和梗（gěng）概，并多次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告诉茅盾，使《子夜》的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。《子夜》一出版，瞿秋白就写文章高度评价，说：“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”，“是中国文坛上的新收获”。瞿秋白和茅盾的这种友谊，在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。

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分子，继续排挤、打击瞿秋白。1934 年 2 月，瞿秋白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瑞金。在这里，他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大众化，四处奔波、劳碌。尽管他的肺病时常发作，高烧不止，身体非常虚弱，但他的精神却一直很好，即使病倒在床上，他也坚持看文件，处理日常工作。

不久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，瞿秋白要求参加，没有得到批准，留在了被

敌军围困的苏区。在转移途中，瞿秋白在福建省长汀县被捕。敌人把瞿秋白单独关在一间囚室里，严加看守。蒋介石得知瞿秋白被捕的消息后，几次派亲信来“劝降”，都被瞿秋白严词拒绝。有一次，他对劝降的敌人说：“人爱自己的历史胜过鸟爱自己的翅膀，请你们不要撕破我的历史。”当敌人用死来威胁他时，他回答说：“古语说得好，‘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’。我不仅闻了共产主义的道，而且为它奋斗了多年，纵然一死，又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呢！”

瞿秋白利用属于他的已经不多的时间，写下了一些坦露胸怀的文章。在这些最后的文稿中，他热情歌颂了党领导的革命事业，申明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，并且无情地剖析了自己的缺点和弱点。他抱着必死的决心，用饱含着情感的文字向自己的同志告别：

“永别了，亲爱的同志们——这是我最后叫你们‘同志’的一次……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，我可以羡慕你们，祝贺你们，但是我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。”

蒋介石见威胁、利诱都没有用，就下令杀害瞿秋白。1935 年 6 月 18 日上午，敌人把瞿秋白押赴长汀罗汉岭下的刑场。走到罗汉岭前养济院旁的草坪时，瞿秋白突然盘腿坐下，说了声：“此地很好！”随后就唱起了《国际歌》。这是他最喜爱的歌曲，也是他第一个把《国际歌》准确地译成了中文。他挺胸面对敌人的枪口，面带微笑，从容就义。

解放后，毛泽东在为瞿秋白遗著出版的题词中说：“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，将永远活着，不会死去……他的遗集的出版，将有益于青年们，有益于人民的事业，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。”

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瞿秋白就义 20 周年时,党中央把他的遗骨迁葬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。他的革命情操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崇敬和怀念。

清贫一生的共产党人——方志敏

“难道我四万万的孩子，都是白生了吗？难道他们真像着了魔的狮子，一天到晚的睡着不醒吗？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伟大的团结力量，去与残害母亲、剥削母亲的敌人斗争吗？难道他们不想将母亲从敌人手里救出来，把母亲也装饰起来，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出色、最美丽、最令人尊敬的母亲吗？”

上面这段献给祖国——母亲充满激情的文字，出自一位 36 岁的共产党人之手。这是他在敌人黑暗的囚室中，用自己的全部感情和心血，向自己的同胞发出的呼号。几个月以后，他就在南昌的下沙窝刑场英勇就义。他就是闽（mǐn，福建省的简称）浙（浙江省的简称）赣（gàn，江西省的简称）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始人、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。

1923 年 3 月，方志敏在南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他认为这是自己“生命史上最可纪念的事”，“共产党员——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做了共产党员，我是如何地引以为荣啊，从此我的一切，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了党。”他用自己洁白无瑕的一生，证明了他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“极尊贵的名词”。

“八一”南昌起义以后，方志敏在家乡江西弋（yì）阳一带领导大规模的农民暴动。一时间，纵横百余里内，到处红旗漫卷，捷报频传。当时，赣东北地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：“湖塘塌塌岭，出了方志敏。领导共产闹革命，都是为穷人。”

当日本帝国主义把魔爪伸向中国华北地区，灭亡中国的野心彻底暴露以后，方志敏遵照党中央的指示，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，挥师北上。途中遭到蒋介石十几万军队的围追堵截，主力部队两千多人陷入敌人的重围。

方志敏考虑到自己是抗日先遣队的总司令，不能丢下大部队先走，就主动进入敌人的包围圈，和被围困的红军将士共同奋战，直到被叛徒出卖，在江西省德兴县怀玉山区被捕。

两个国民党士兵把方志敏浑身上下搜查了好几遍，满指望能从方志敏身上发一笔大财。没想到，除了一块旧怀表、一支钢笔和一枚私章外，连一个铜板也没找到。这两个家伙火了，拿出手榴弹，吓唬方志敏说：“赶快把钱交出来，要不，就炸死你！”方志敏轻蔑地一笑，说：“想从我这里发洋财，找错门啦！告诉你们，我们不像你们国民党当官的那样钱迷心窍。我们是为革命，不是为发财。”两个家伙这才失望地拿走了他的旧表和钢笔。

在敌人看来，方志敏这个共产党的“大官”，居然身边连一个钱也没有，这实在太奇怪了。但方志敏是一个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共产党员，他这样清贫，正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本色。他不是没有经手过钱，在赣东北，他是工农民主政府的主席，手头的钱有几百万元，却一点一滴都用在革命事业上。他的生活跟普通战士一样，每天除了粮食，只有四分钱的菜金，袋子里也不剩下一个铜板。他的一条裤带，用断了接上再用。北上之前，他留在赣东北的惟一财产，就是几件旧汗衫和几双缝着补丁的线袜。

方志敏就是这样艰苦地生活着，工作着，战斗着。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：“清贫，洁白朴素的生活，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。”

在狱中，方志敏一刻也没有停止革命斗争。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百般引诱，他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。他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必须把从事

革命斗争的经验，尽快地写出来，向党中央汇报。在短短的 70 多天里，他写下了《可爱的中国》、《死——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》、《清贫》、《狱中给全党同志的信》等约 13 万字的文章。通过同情革命的看守，他把全部文稿和密信委托鲁迅转交给党中央，为党和人民留下了一笔极宝贵的精神遗产。

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被敌人杀害了，但是他没有死。正像他在狱中给党中央的密信中所写的那样：“ 我流血的地方或我瘞（yì，掩埋的意思）骨的地方，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，这朵花，你们可视为我的精神寄托吧！在微风吹拂中，如果那朵花上下点头，那可视为我在向中华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致以革命的敬礼！如果那朵花左右摇摆，那就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！ ”

忠心耿耿的人民英雄——刘志丹

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陕北出了一个被穷苦人当成救星的人，他就是西北红军和陕甘宁（陕西、甘肃、宁夏）革命根据地最早的创始人之一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刘志丹。

刘志丹生长在陕北最贫穷的老百姓中间。在这块贫瘠（jí）的黄土高原上，曾经哺育出闯王李自成这样了不起的人物，许许多多关于这位农民起义领袖为民除害的故事，从小就在刘志丹的心里扎下了根。

刘志丹在陕北榆林中学读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。中学没毕业，他就南下广州，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习。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和共产党合作创办的一所革命军事学校。在那里，刘志丹不仅学到了军事知识，还大大增强了党性，使他能够在后来出生入死的环境中，以百折不回的意志为党工作，为人民闯江山，打天下。

1928 年 5 月，刘志丹和几位同志共同领导了“ 渭华暴动 ”，建立起陕西第一个苏维埃政权。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，却为刘志丹后来开展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

在多年的冲杀中，刘志丹炼就了一副钢筋铁骨，并有过好几次传奇式的死里逃生的经历。他白手起家，打一仗增长一分才干，扩充一点队伍，硬是把一支不起眼的游击队发展成拥有数千人的红军第二十六军，把一块微不足道的红色区域，发展为坚固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。他多次粉碎了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对根据地的围剿，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，使当时这块全国惟一保存下来的革命根据地，成为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。

刘志丹立下的不朽功勋，使他在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。虽然他的年纪还很轻，可同志们和老乡们都不习惯叫他的名字，而亲切地称呼他“ 老刘 ”。在一次行军途中，一位 70 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听说刘志丹来了，一定要赶来探望，别人笑着问：“ 大娘，你怎能看见老刘啊？ ”她说：“ 看不见，我还摸不着吗？ ”刘志丹立即走到老人面前，拉起她的手，叫声：“ 大娘，我就是刘志丹。 ”老大娘把他从头摸到脚，又从脚摸到头，激动地流着眼泪说：“ 好哇！好哇！你真是咱老百姓的好人啊！ ”在场的许多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。刘志丹就是这样一个和劳苦大众保持血肉联系的人。难怪当年在群众和战士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：

“ 二月二，三月三，
陕北出了个刘志丹。
率领红军打横山，
娃娃大人都喜欢，
妇女老太太送鸡蛋。 ”

然而，在一段时间里，由于党内的“ 左 ”倾错误，刘志丹这位身经百战的红军领袖，竟然蒙受了不白之冤，甚至被关进监狱。他随时有被“ 自己的同志 ”处死的危险，但他始终以革命大局为重，没有丝毫怨言，他坚信总会有弄清事实真象的一天。

正当刘志丹处境危险的时候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。他听说刘志丹被关押，立即下了“ 刀下留人 ”的命令，使刘志丹和其他受诬陷的同志获得了释放。重见天日的刘志丹把一肚子委屈全抛在脑后，一见到周恩来，就亲热地叙旧说：“ 周副主席，我是黄埔四期的，是你的学生。 ”当年担任

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说：“ 我知道，我们是战友。 ”接着，周恩来又领他去见毛泽东。他们亲切地安慰刘志丹，说：“ 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。 ”刘志丹激动地说：“ 感谢党中央的英明处理。中央来了，今后的事情都好办了。我一定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努力工作，为完成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。

不久，党中央组织了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，开赴抗日前线。刘志丹奉命率领红二十八军东征，连战皆捷，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。 1936 年 4 月 14 日，在进军山西的一次战斗中，刘志丹亲临前线，指挥战斗，不幸中弹牺牲，年仅 33 岁。

当时，敌人的子弹击中了刘志丹的左胸，伤了心脏，他顿时昏迷过去。但他刚刚醒来，就以顽强的毅力，断断续续地告诉身边的同志：“ 让政委……指挥部队……赶快……消灭……敌人。 ”说完，就停止了呼吸。

刘志丹牺牲的噩（è）耗传出后，整个陕北高原都震动了，根据地的人民为失去一位像亲人一样的红军领导人感到无比悲恸。

1942 年，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：“ 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见过一面，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。他的英勇牺牲，出于意外，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，不会磨灭的。 ”周恩来的题词同样代表了人民给予这位杰出革命家的公正评价：

“ 上下五千年，
英雄万万千。
人民的英雄，
要数刘志丹。 ”

在烈火中永生的大将军——叶挺

辛亥革命以前，没有辫子是革命党人的重要标志之一。叶挺还在小学读书的时候，就把象征清朝统治的长辫子剪掉了。为这件事，他被赶出校门，关进了黑牢，并且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叶挺先后在广东、湖北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。学成之后，他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队。

后来，叶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的团长。因为这个团是由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，不同于别的军队，大家称它为“独立团”。

北伐战争开始以后，独立团像一把锋利的尖刀，出广东，进湖南，势如破竹，直刺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心脏。独立团连克敌人重兵设防的战略要地汀泗桥、贺胜桥，击溃敌人精兵数万。接着，独立团又直扑武昌，架梯越墙，最先攻入城内。攻占武昌的胜利，不仅宣告了吴佩孚的彻底垮台，而且标志着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由于独立团无往不胜，战功卓著，被人民赞誉为“铁军”，叶挺也获得了“北伐名将”的称号。

在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以后，叶挺到国外度过了 10 年流亡生活，一度脱离了共产党。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共产党促成了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，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叶挺受命出任新四军军长。在短短的三年中，叶挺指挥的新四军取得了歼灭日伪军十多万人的辉煌战绩，还在敌人后方建立起一片又一片抗日根据地，使新四军从一万多人发展到十万余人。

正当新四军节节胜利的时候，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“皖南事变”，新四军将士几千人壮烈牺牲，叶挺将军被俘。

叶挺被俘以后，国民党千方百计地诱使他投靠蒋介石，都没有得逞。有一次，敌人又耍出新花招，说只要叶挺说一句“皖南事变是共产党挑起的”，就可以和他“合作抗日”。叶挺勃然大怒，拍着桌子痛斥敌人：“请你们把这一套收起来吧。你们反复无常，不顾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诺言，悍然发动这次事变，陷害新四军。‘合作抗日’四个字，亏你们说得出口！”

为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自己的迫害，叶挺决定把头发蓄起来，胡子也不刮，长得长长的。他表示：“不恢复我的自由，就不理发，不刮胡子！”敌人把叶挺押往重庆，临上飞机前，特意给他送来一套国民党的将军服，满指望他会换上。谁知下飞机的时候，他仍然穿着破旧的新四军军装。几年后，叶挺获释出狱，国民党当局又给他送来一套军官呢制服，要他换上，他再次拒绝说：“我不换！我要穿着新四军的军衣回去！”这些都充分表现出叶挺的革命军人的本色。叶挺被囚禁在重庆“中美合作所”期间，怀着嫉恶如仇的情感，写下一首题为《囚歌》的诗：

“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，
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，
一个声音高叫着：
——爬出来吧，给你自由！

我渴望自由，
但我深深地知道，

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！

我希望有一天，
地下的烈火，
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，
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！”

这是一个革命军人的誓言，这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者的心声。

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经过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斗争，爱国民主党派、民主人士的大力声援，蒋介石被迫释放了叶挺。在中共代表团为他召开的欢迎会上，叶挺激动地说：“我总结了过去的经验，我认识清楚了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一个和平、民主、富强的国家。”出狱第二天，他就拍电报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，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只隔了一天，党中央就复电叶挺，批准了他的请求。

正当时挺准备全力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时候，他不幸因飞机失事，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难，时年 50 岁。

叶挺将军用自己为民族解放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，实现了他在《囚歌》中的誓言，“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！”

争取和平民主的杰出代表——李公朴 闻一多

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蒋介石一面积极准备发动内战，一面不断地对争取和平民主的人民群众进行血腥镇压。1945 年 12 月 1 日，国民党当局在昆明制造了“一二一”惨案，杀害教员、学生 4 人。不久，国民党当局又指使特务、暴徒，在重庆较场口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，大打出手，制造了打伤郭沫若、施复亮、马寅初、章乃器等民主人士的“较场口事件”。中国民主同盟（简称民盟）中央委员李公朴，是这次集会的总指挥，也被打成重伤。

反动派为什么这样痛恨李公朴呢？原来，李公朴很早就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。1936 年，当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，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，李公朴和沈钧儒、邹韬奋、沙千里、史良、王造时、章乃器一起，因为参加抗日救国运动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，他们不论在狱中，还是在法庭上，都团结一致，坚贞不屈地同反动派斗争，历时 8 个多月。这就是轰动全国的“七君子”事件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李公朴和全国人民一样，既为胜利而欢呼，也为严重的内战危机而担忧。他在西南联合大学举办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，朗诵了一首《不要让胜利冲昏了头脑》的新诗，提醒人们：

“今天，我们为团结胜利与民主而歌，
却不要让胜利冲昏了头脑，
团结的障碍多得很，
民主的暗礁更不少，
让我们抓紧时机，打定主意，
把民主和平的呼声高唱入云霄！”

“较场口事件”发生后，周恩来去医院慰问受伤人士，李公朴忍住伤痛对周恩来说：“为了和平民主，为了祖国统一，我受点伤算不了什么。”他还对夫人说：“马寅初那么老，为了爱国同胞随时准备死。我们年壮的人，更得随时准备死！”他已经把生死完全置之度外了。

出院后，李公朴又来到昆明，继续推动爱国民主运动。反动派把他当成了眼中钉，他们把毒手又一次伸向了李公朴。1946 年 7 月，一个细雨濛濛的夜晚，国民党特务在昆明街头，用美制无声手枪朝李公朴连开三枪。经送医院抢救无效，李公朴于第二天凌晨去世。临死前，他还睁开眼睛，大骂反动派：“卑鄙！无耻！”

李公朴被害的消息，震动了全国。毛泽东、朱德从延安打电报给李公朴夫人，说：“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，威武不屈，实为全国人民之损失，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！”

7 月 15 日，云南大学为李公朴被刺举行报告会。闻一多怀着悲愤的心情来到会场。闻一多是西南联合大学教授、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和学者。以前，他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，发起和组织过反对内战的签名运动，他曾经在一次集会上说：“蒋介石这些年造了那么多的孽（niè），害了那么多的人，骂一下都不行吗？我有名有姓，我叫闻一多，我就要骂！”

如今，闻一多不顾自己已经上了国民党特务黑名单的危险，在报告会上，面对混在人群中的国民党特务，拍案而起，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呐喊：

“这几天，大家晓得，在昆明发生了历史上最卑鄙最无耻的事情！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，要遭这样的毒手？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，用嘴说真话。

他所写的、说的，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！大家有笔，有嘴，有理由拿出来讲啊！为什么要打，要杀，而且偷偷摸摸地杀！”说到这，大家热烈鼓掌，支持闻一多对反动派的质问。

闻一多怒目环视了一下全场，又接着说：“今天，这里有没有特务？是好汉的站出来！你出来讲，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？”大家更热烈地鼓掌。

“你们以为打伤几个，打死几个，就可以把人民吓倒吗？其实，广大人民是杀不完的！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，会有千百万个民主战士站起来，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！”面对这正义的声音，在场的特务都现出了原形，他们耷（dā）拉着脑袋，不敢抬头看闻一多。

最后，闻一多握紧拳头，说：“争取民主和平是要付代价的，我们绝不怕牺牲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样，跨出了门，就不准备再跨回来！”

听众都被闻一多的演说深深感染了，他们用雷鸣般的掌声，表达了对这位和平民主斗士的由衷敬意。

但是，闻一多这《最后一次的讲演》，却刺痛了反动派的每一根神经。报告会结束不久，特务们就对他下毒手了。那天下午，闻一多参加完《民主周刊》社的记者招待会，由大儿子陪伴回家，眼看就要走到家门口的时候，几个特务从阴暗的角落里窜出来，朝他连开数枪。闻一多头部中弹倒下，儿子扑在父亲身上，连声喊道：“你们不要打他，打我吧！”可灭绝人性的特务仍不罢休，又朝闻一多连开数枪。闻一多就这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

两位争取和平民主的杰出人物：李公朴和闻一多，一位只有 46 岁，另一位只有 47 岁，相隔不过 4 天，竟然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，造成令人发指的“李闻血案”。

周恩来为“李闻血案”发表严正声明，指出：“这完全是有计划的，而且是肆（sì）无忌惮（dàn）的政治暗杀……完全赤裸裸地暴露了国民党特务残暴的法西斯本质，采用了最卑劣的手段来镇压和平民主运动及其代表人物。”

“李闻血案”唤起了千万人的觉醒。李公朴和闻一多死后仅仅 3 年，反动派的末日就到了，光明的中国代替了黑暗的中国。胜利了的人民将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！

“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”的——刘胡兰

刘胡兰是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，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。幼年的刘胡兰，亲眼看见地主老财横行霸道，阎锡山军队欺压百姓，日本鬼子烧杀抢掠，心中气愤极了。

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来到云周西村，赶走了“黑军”（当地老乡对阎锡山军队的称呼），还帮助乡亲们干活。刘胡兰高兴极了，她常常找战士们玩，听他们唱歌，讲打日本鬼子的故事。从此，刘胡兰懂得了共产党好，八路军好，立志要像英雄那样做人。

刘胡兰小小年纪就参加了妇救会，和大人一样，为八路军做军鞋、军袜，给抗日游击队洗衣服，还挨家挨户宣传抗日，动员群众抗拒向敌人交粮。

抗日战争胜利以后,刚满 13 岁的刘胡兰参加了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。奶奶心疼孙女，怕她将来有风险，到训练班哭闹，要胡兰子（刘胡兰的小名）回家。可刘胡兰一心扑在学习上，她咬咬牙，坚持不见奶奶。

奶奶病倒了。临终前，她紧紧拉住胡兰子的手，要她答应不再到外边工作。刘胡兰看着把自己抚养长大的奶奶就要离开人世，非常难过。她爱奶奶，但更爱革命工作，直到奶奶嚥气，她也没有答应老人家的请求。

刘胡兰当上区妇联干部后，工作更积极了。不久，她向党组织郑重地提出了入党申请。区委会认为，她虽然还不满 15 岁，但她的表现和思想觉悟已经达到了共产党员的标准，所以，批准她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，等到年满 18 岁再转为正式党员。

刘胡兰入党后，全面内战爆发了。阎锡山的军队又开进了文水县，当地的地主武装也乘机猖狂活动，情况十分紧急。县委决定把党的骨干转移上山，暂时隐蔽起来。刘胡兰坚决要求把自己留下来，坚持斗争。县委经过慎重研究，批准了她的请求。

斗争的形势比人们估计的还要严峻得多。1947 年 1 月 12 日上午，敌军包围了云周西村，把全付的男女老少都赶到观音庙前，还抓了几个人在庙里拷打。刘胡兰预感到情况不妙，摘下奶奶留给她的银戒指，又从衣兜里掏出一块手帕（一位八路军烈士的遗物）和一盒清凉油（她的入党联系人送给她的纪念品），把这三件小东西交给了继母胡文秀。这点东西虽然不值几个钱，但却是刘胡兰的心爱之物。

敌人果然发现了刘胡兰，几个匪军粗暴地把她推进观音庙里的西厢房，开始了对她的审讯。满脸胡子的敌军特派员问刘胡兰：“你给八路军做过什么事？”

刘胡兰早已抱定了为革命牺牲的决心，她大声回答：“我什么都做过！”

大胡子吃了一惊，又问：“你最近和哪些共产党员见过面？”

“没有和谁见过面。”刘胡兰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“现在有人供出来了，说你是共产党！”

刘胡兰知道是叛徒出卖了自己，就把头一扬，正气凛然地答道：“说我是共产党，我就是共产党，共产党又怎么样？”

大胡子乘势追问：“你们村还有谁是共产党？”

“就我一个共产党！”刘胡兰的语气中透出对敌人的蔑视。

大胡子奸猾地笑了笑，说：“只要你当众‘自白’，说你是受了共产党的骗，今后不再给共产党干事了，这桩大事就一笔勾销。”

“ 呸，这办不到！ ”刘胡兰断然拒绝。

大胡子气得蹦起来，敲着桌子吼道：“ 你小小年纪，好嘴硬呵！你难道不怕死？ ”

刘胡兰昂首挺胸，答道：“ 怕死就不当共产党！ ”

敌人眼见威胁、利诱都失败了，就把刘胡兰架出了观音庙。乡亲们见胡兰子被押出来，一阵骚动，荷枪实弹的敌军用枪口逼着乡亲们后退。大胡子叫人抬来三副铡刀，当众宣布：“ 凡是‘ 自白 ’的都可以‘ 转生 ’，不‘ 自白 ’的立即处死。 ”

接着，敌人的屠杀开始了，有六个不向敌人低头的乡亲，被凶残的敌人用铡刀铡下了头。这时候，大胡子狞笑着问刘胡兰：“ 你怕不怕？‘ 自白 ’不‘ 自白 ’？ ”

刘胡兰冷笑一声，说：“ 我死也不屈服，决不投降！ ”说完，她深情地看了乡亲们一眼，猛然大喝一声：“ 我咋个死法？ ”

大胡子一怔，发出疯狗似的狂叫：“ 和他们一个样！ ”

刘胡兰二活没说，从容地向铡刀走去。

年仅 15 岁的刘胡兰,就这样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

1947 年 3 月，毛泽东得知刘胡兰牺牲的消息，当即挥笔写下“ 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 ”八个大字，对刘胡兰短暂的一生作了崇高的评价。

刘胡兰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女儿，她的伟大精神一直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，为解放和建设祖国奋发向上。

舍身为国的战斗英雄——董存瑞

河北省隆化县北郊，有一片松柏长青的园林，不朽的战斗英雄董存瑞就长眠在这里。在董存瑞左手高擎炸药包，右手拉燃导火索的高大塑像后面，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纪念碑，碑身上铭刻着朱德总司令的题词：

“舍身为国，永垂不朽！”

董存瑞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，他从小就是个爱憎分明、机智勇敢的孩子。有一次，日本鬼子突然闯进村里，要抓一名抗日干部。董存瑞把这位干部藏在自己家墙根下一捆破席卷里，四五个鬼子来搜查，闹得鸡飞狗叫也没有找到，最后发现了那几捆破席，正要过去翻，董存瑞急中生智，抢先抱起一捆积满尘土的破席卷，使劲摔在地上，一股难闻的气味和呛人的灰尘把鬼子呛跑了。

不久，村里成立了儿童团，14 岁的董存瑞当上了儿童团长。后来，他又参加了民兵自卫队，和鬼子、汉奸、日伪特务斗争。16 岁那年，董存瑞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，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。

在参军后的两年多里，董存瑞打了好多次硬仗。他先后缴获过敌人三挺机枪，立过三次大功，四次小功，荣获过三枚勇敢奖章，一枚毛泽东奖章。他的射击、投弹、刺杀三大技术，在全连总是数一数二。他投手榴弹又远又准，大家都称赞他是连里的“小钢炮”。

1948 年 5 月，人民解放军逼近了敌人的重要据点隆化。敌人在城周围修筑了大大小小、高高低低的许多“子母堡”，还用看不见的暗沟把碉堡都连起来，在敌人司令部的所在地——隆化中学，更是碉堡林立，甚至每一幢建筑物的每一面墙壁都变成了有射击孔的夹墙。敌人吹嘘：“隆化固若金汤，是什么力量也攻不破的！”显然，这次战役最艰巨、最光荣的任务是“爆破”，只有炸掉敌人的碉堡群和火力点，才能为解放隆化铺平道路。

六班班长董存瑞和战友们争先恐后地报名请战。由于董存瑞是全师有名的“模范爆破手”，爆破任务到底被他“夺”到了手。他激动地对爆破组的战士说：“这次，党把最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，我坚决完成任务，不消灭敌人，决不回来！”

5 月 25 日，主攻开始了。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，董存瑞挟起炸药包，率领爆破组飞身跃起，一阵风似地冲向敌人的炮楼。敌人用机枪封锁他们前进的道路。还没有接近炮楼，就有两名爆破手牺牲了。董存瑞让担任火力支援的战友郅（zhì）顺义用手榴弹掩护，随着爆炸的烟雾，董存瑞闪电般地扑到敌人的炮楼前，在炮楼的两个射击孔之间支好炸药包，拉燃导火索，翻身滚下地沟，只听轰隆一声巨响，炮楼被炸得四分五裂。就这样，他一鼓作气，接连炸毁了敌人的 3 个炮楼和 5 个碉堡，隆化中学东北角的防线被打开了缺口。

战友们立即跃出战壕，向敌人的司令部猛扑过去。突然，中学外侧的一座桥上，掉下一块块墙砖，露出了 6 个射击孔，6 挺机枪喷出毒焰般的火舌，冲在前面的战友纷纷中弹倒下，部队无法继续前进了。原来，这是一座修在于河上的桥型暗堡。

连长连续组织了两次爆破，都因为敌人火力太猛，没有成功，几个爆破手还没有通过封锁区就牺牲了。董存瑞急红了眼，他来到连长前面，坚定地说：“我去干掉它！”那顺义也表示，愿意继续掩护六班长爆破。连长和指

导员同意了他们的请求。

出发前，董存瑞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包，里面包着奖章和钱，他把小包交给指导员，说：“ 如果我牺牲了，奖章交给党组织，钱算我交的最后一次党费！ ”说完，董存瑞就在郅顺义的掩护下，打一阵，跃几步，再打一阵，再跃几步，逐渐接近了桥型暗堡。敌人的机枪子弹从他们身边“ 嗖嗖 ”地掠过，董存瑞的左腿不幸负伤，鲜血直流。乘着郅顺义又一颗手榴弹爆起的烟尘，董存瑞终于跃进了干河沟。

可是，干河沟的沟底离桥身有一人多高，桥的两头都是光滑的桥墩，桥沿也没边没棱，炸药包根本没地方摆，把炸药包放在沟底又不顶事，这可把董存瑞急坏了。正当他想办法的时候，最后的攻击开始了，后续部队不顾伤亡，一批又一批地往前冲。在这紧急关头，桥壁上又露出十几挺机枪。“ 哒哒哒 ”地射向自己的战友。

不容许再有片刻迟疑了。董存瑞忍住左腿剧烈的伤痛，支撑起身体，用左手托起了炸药包，用右手猛地拉开导火索。导火线烧着了，“ 嘶嘶 ”地燃向炸药包，他回头看看潮水般涌来的战友，又看看暗堡射出的火光，用尽全身力气，高声呼喊：“ 同志们，为了新中国，冲啊！ ”

随着一道红光，发出天崩地裂的巨响，敌人的暗堡飞上了天。董存瑞用自己年仅 19 岁的生命，为部队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。

“ 为董存瑞报仇，冲啊！ ”大部队随着爆破的巨响，冲进了隆化中学。隆化解放了。

为了永远纪念英雄的事迹，永远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，董存瑞被追认为全国战斗英雄、模范共产党员，他生前所在的六班被命名为“ 董存瑞班 ”，隆化中学也改名为“ 存瑞中学 ”。人民为有这样的好儿子而感到骄傲。

中华女儿革命的典型——江竹筠

江竹筠就是人们熟悉的“江姐”。正当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已经响过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残余势力即将彻底覆灭的前夜，江姐如同迎春傲雪的红梅，伴着人民解放军的炮声，于 1949 年 11 月 14 日英勇就义，年仅 29 岁。

江姐 8 岁就随母亲背井离乡，逃荒到了重庆，10 岁进一家袜厂当童工。贫苦动荡的生活，磨练出她那钢铁般的性格。江姐 19 岁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从此，她作为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，在异常艰险的环境里，同敌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。

江姐的丈夫彭咏梧是重庆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，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，他们经常天各一方，很少能生活在一起，就连刚刚 1 岁的儿子彭云，也被江姐寄养在一个同志家里。

不久，在四川省东部，打游击的彭咏梧不幸牺牲，敌人残暴地割下他的头颅示众。噩耗传来，江姐难过极了，但她强忍住失去亲人和战友的巨大悲痛，要求党组织批准她回川东去。她说：“革命总会有牺牲，我要到老彭工作过的地方去战斗。”组织上同意了她的请求。

由于叛徒出卖，江姐不幸在万县被捕。国民党特务头子徐远举听说江姐是彭咏梧的妻子，亲自来审讯她，妄图从她嘴里打开地下党组织的缺口。

审讯特意安排在徐远举的办公室，屋内摆上了老虎凳、吊索、电刑机器、“披麻带孝”（有刺的钢鞭）、水葫芦、火背篼（dōu）、撬杠等各种刑具，想给江姐来一个“下马威”。

江姐对那些刑具只轻蔑地掠了一眼。徐远举一连向江姐提了 10 多个问题，得到的回答不是“不知道”，就是“不认识”。到后来，干脆连一个字也不说。

徐远举连声吼叫着，下令上刑。特务拿来一把特制的四棱筷子，用力夹在江姐的几个手指间。江姐疼得几乎昏了过去，可她仍坚定地对敌人说：“你们可以整断我的手，杀我的头。要我说出组织，永远办不到！”

特务再用力夹，江姐疼得昏了过去。被凉水泼醒以后，她更坚定地说：“筷子不行，把刀子拿来。你们这是野兽行为。你们以为刑具是万能的，我看是无用的！”

酷刑继续进行着，江姐被折磨得死去活来，可敌人照样得不到他们需要的“口供”。看着江姐傲然不屈的样子，连门外的几个男女特务都悄悄地议论：“这个女人真厉害……”“不用说……她是真正的共产党。”

几天后，敌人趁江姐的旧伤还没有痊愈，又用竹筷子一次次猛夹她的手指，见她疼得汗流满身，仍不开口，就残酷地把竹签子钉进她的指尖。江姐疼得几次昏死过去，可一旦醒来，仍忍着十指连心的疼痛，怒斥敌人：“你们简直是一群野兽……你们是枉费心机，永远也达不到你们的目的……”

敌人把各式各样的刑具都使上了，仍然无法征服这位女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。他们的卑鄙企图破产了。

渣滓洞牢房的难友们每次见到江姐受刑回来，都隔着囚室的风门，流着热泪，向她投去无限崇敬和关切的目光。有位难友用竹签子蘸（zhàn）着红墨水，在草纸上写了一首诗，代表全体难友献给江姐：

“你是丹娘的化身，

你是苏菲娅的精灵，

不，你就是你，

你是中华女儿革命的典型”。

丹娘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女英雄，苏菲娅是俄国的一位女英雄。而我们的江姐就是她自己，是“中华女儿革命的典型”。

这首诗只是许多赠给江姐的诗中的一首。江姐捧读着一首首饱含革命情谊的诗，心情无比激动，眼里闪动着泪花说：“同志们太好了，我算不了什么……”她的手还不能动，就请同室的难友帮她写回信：“……毒刑是太小的考验，筷子是竹做的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……”

江姐的行动，为全体难友树立了榜样，渣滓洞 200 多位难友形成了战斗的集体。敌人在坚强不屈的共产党人面前，彻底失败了。

江姐就义前 3 个月，托人从狱中捎出了一封信，写给彭云的抚养人，信中说：“……假如不幸的话，云儿就送你了。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，以建设新中国为志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。孩子们决不要骄养，粗服淡饭足矣……”

处决的时刻到来之前，江姐脱下囚衣，换上自己的旗袍，梳理好头发，从容不迫地和难友们告别，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。

江竹筠烈士“抛头献生为人民，笑洒热血染山河”的崇高品格，将永远被人民广泛传颂。